

作，擗捨割裂，分成二部，不但牽引以解春秋經的左傳不合解經之傳的體例，就是剩下的那部國語，也變成畸形的，不完全的史書了。如果把左傳仍合入國語中，使復五十四篇之舊，則當不愧爲那時代的一部良史的記事的史書，而且有它特具的文藝價值。所以左傳與春秋經，可以說是『離之則兩美』；左傳與國語，可以說是『離之則兩傷！』

第十一章 論語

孔子傳易，纂書，定禮，正樂，以正詩，據魯史以作春秋；其後學又爲春秋作傳，并各記所聞，各抒所見，纂輯而成禮記。故上述十三經之九，惟周禮一書與孔子無甚關係，其餘八種，直接間接，都是和他有關係的。這樣偉大的一位學者，他平生的言行，當然值得我們注意。我們要知道孔子的言行，便不得不一讀論語。漢書藝文志說：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說，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經典釋文敍錄所記略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則謂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漢志所說，則因夫子弟子之語，門人論纂之，故名曰論語；如何異孫說，則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故名曰論語。此二解，雖略有出入，尙不甚相遠。至以「倫」訓「論」，謂論語所記皆倫理之言，又有一經編今古，「輪轉無窮」諸義，則爲後儒尊重此書者的話，不是當時命名的本意了。

編纂論語的人，鄭玄說是仲弓、子夏。（經典釋文敍錄引。）柳宗元論語辨言之較詳。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必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當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按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見史記仲尼弟子傳。論語記曾子將死的事，有二章，均見泰伯篇，今錄如下：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簞豆之事，則有司存。』」

孔子歿後，弟子曾以有若爲師。後復叱避，史記仲尼弟子傳曾詳記其事：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

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立以爲師，又叱其避席，未免太兒戲了。孟子也曾提起過這件事，說：「孔子歿後，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見滕文公有爲神農之言章。）我嘗推想，大概弟子們雖曾有此提議，終以曾子反對而罷。史記所錄，想是因此而推演的一種傳說。弟子所以有此提議者，必因有若平時言行，爲同學所欽佩的緣故。按論語不但記孔子弟子中年皆最幼的曾子之死，而且於當時國君大夫，如魯哀公、季康子、子服景伯諸人，皆舉其諡，故其成書之年，必在孔子卒後數十年。且全書第一章記孔子語，第二章即記有子語，第三章記孔子語，第四章即記曾子語，則纂輯者當爲有子曾子的門人，其所記孔子言行，或即有子曾子所筆錄或口述的，亦未可知。

論語的本子，也有今文古文之別。今文本又有二種：一爲魯論，魯人所傳，共二十篇；一爲齊論，齊人所傳，共二十二篇。古文本則稱古論，據說也是魯恭王得之孔宅壁中，共二十一篇。齊論所多二篇，曰問王，曰知道。（見漢志自注，經典釋文敘錄同。）今俱亡失，內容如何，已不可知。或謂說文解字玉部多引孔子語，「問王」恐係「問玉」之誤。但也無從考究了。古論怎麼也多一篇呢？漢志自注但云「兩子張」。注引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按古論所多一篇，今已亡失。但今本堯曰

篇本僅三章，若再分後二章爲另一篇，恐無此理。且漢志明說「有兩子張」，則篇名非題「從政」可知。如淳之說，想係臆度之辭。據經典釋文敘錄，則齊論除多二篇外，其餘二十篇，章句亦頗多於魯論；又謂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且引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則此三種本子不同之點很多，不僅篇數多少而已。西漢末，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見何晏論語集解序。）隋書經籍志也說：「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那末，今本二十篇論語，就是這種張侯論了。

古以竹簡代紙，傳寫收藏皆不易。故篇末空白處，往往利用之以記其他見聞所及。此在附記者，原爲簡事備忘起見，並非有意作僞；到後來輾轉傳鈔，以之誤入正文，則成爲僞書了。先秦古籍中，此類很多，論語也有其例，如雍也篇末有一章云：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是衛靈公的夫人，是一個淫亂的婦人，宋人當時有「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緞」的話，就是譏嘲南子和她的外遇宋朝的。孔子去見她，還可說是出於不得已；子路是個心直性急的人，也難怪他不悅。但孔子何以不向他仔細解釋，却急得發誓呢？所以崔適洙泗考信錄認此章爲不可信。史記孔子世家却把這件事演述得像煞有介事道：

「……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向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鄉黨篇末也有一章，注者多不得其解，或亦疑是後人附入的：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這短短的一章書，便有三種解說：（一）「共」同「拱」，「拱之」是對雉行敬禮。「嗅」爲「雌」之借字，是雉叫。子路聽到孔子說雉的識時，便向牠致敬，那隻雌雉叫了三聲，便飛去了。子路似乎不至於迂到如此。（二）「共」同「供」，「嗅」卽「鯁」。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類，以爲他嘆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孔子嗅了三嗅，便站起來不吃了。（何晏集解，皇侃義疏卽如此解。）這便是「燒烤雉雞」的本事。子路又何至這般傻？（三）拱，揜也，執也。雉正倦飛，子路揜而執之，旋又釋之，故三嗅而作。「嗅」五經文字作「臭」。此字從目，從犬，張兩翅也。「鳥曰臭」見爾雅釋獸，爲飛動之稱。呂氏春秋審己篇已有「子路揜雉而後釋之」的話了。孔子子路散步山野間，見雌雉集於山梁。孔子歎道：「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孔子此歎，頗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之意，寄慨遙深。子

路之加揜執，原屬隨意遊戲；又聞孔子之言，因復釋之。這一解比上一說近情理多了。此外，還有不倫不類的幾章，如季氏篇末章云：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微子篇末，則有兩章：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這三章和孔子是絕無關係的，和論語所記的性質是完全不合的，無疑地是後來附記的了。

論語不可信的記錄，不僅此類。例如陽貨篇中便有兩章：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佛肸召。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人非匏瓜，不能掛起來不吃飯，誠然是事實。可是爲了吃飯問題，而不恤降志辱身，去入叛逆的夥，怕不是作春秋以筆誅亂臣賊子的孔子所應出此按費，季氏之都。公山弗擾（左傳作不狃）據費以叛，見左傳定公

十二年。此時孔子正爲魯的大司寇；公山氏之叛，正因反對孔子墮三家之都的主張，所以於叔孫氏墮其都郕之後，卽帥費人以襲魯。定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矢（本作「入」誤）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公山氏遂奔齊。我們試想：一個反抗政府命令的縣長，竟敢去召正在主張並執行這命令的政府要人；下令討伐這叛變的縣長的要人，竟願應召前往，而且想奉這叛變的縣長爲東周；按之事實，度之情理，是決不可信的！卽依史記孔子世家，把此事列於定公九年；但孔子爲司寇，相定公於夾國之會，卽在定公十年之夏，則此時孔子仕魯必已漸漸得志了，何至於窮無所歸，竟想去投奔叛逆呢？至於佛肸以中牟叛趙，韓詩外傳，在趙襄子時。孔子卒後五年，趙襄子方嗣立。怎麼還會有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之事？這兩件事，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崔述的洙泗考信錄，辨之均極詳確。論語中屢入了這兩章，司馬遷又采入史記孔子世家中，於是後世一般附羶逐臭之人，或藉口於吃飯問題，或竟自命爲磨而不磷之堅，涅而不緇之白，甚且自詡「吾其爲東周。」則此二章論語，不僅誣衊孔子，並且貽害無窮了！

論語通例，稱孔子皆曰「子」，記其與君大夫問答乃稱「孔子」，而末五篇則屢稱「孔子」。「仲尼」。論語通例，記門弟子與孔子對面問答亦皆呼之曰「子」，對面呼「夫子」，戰國時乃有此習慣；而未

五篇則屢稱「夫子」。又如季氏篇記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云云；冉有、季路也並無同時仕於季氏之事。所以崔述認爲這五篇皆有可疑之點。我們讀論語時，須先參閱洙泗考信錄等書，把可疑的部分剔出，至少把它們劃爲外篇，然後去細讀其他可信的部分。

論語二十篇的篇目是——

1. 學而
2. 爲政
3. 八佾
4. 里仁
5. 公冶長
6. 雍也
7. 述而
8. 泰伯
9. 子罕
10. 鄉黨
11. 先進
12. 顏淵
13. 子路
14. 憲問
15. 衛靈公
16. 季氏
16. 陽貨
18. 微子
19. 子張
20. 堯曰

這二十篇的篇題都是無義的，各取本篇第一章首二句的二三字爲題。如第一篇第一章開始是「子曰，學而時習之……」故取「學而」二字名篇；第二篇第一章開始是「子曰，爲政以德……」故取「爲政」二字名篇。編次體例既無規定，篇章次序也無甚意義。不過第一篇第一章，在本書，在孔子一生，確是很重要而有價值的一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說」同「悅」，「悅」指內心的悅懌，「樂」則爲現於外表的快樂。「學」卽「知新」，「習」指「溫故」。能「學而時習」，則一面知新，可以「日知其所亡」；一面溫故，可以「月無忘其所能」；自然深造自

得，左右逢源，內心說懌了。這是「學不厭」的功效。師弟子有朋友之道焉。（見白虎通辟雍篇。）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有朋自遠方來」就是弟子至自遠方。朋來之樂，也就是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樂。「人不知而不慍」朱子以爲卽是「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義，雖當世君相不知我而不慍。我則以爲如朱注所說，當曰「人不知我而不慍」方纔明白。「人不知」者，言人不知道，不是說人不知我。何晏集解曰：「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皇侃論語義疏後一解亦云：「君子易事，無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之也。」焦循論語補疏亦謂「人有所不知，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慍之，矜也。」「人不知而不慍」正是「教不倦」的精神。「學不厭，教不倦」是孔子最偉大的教育精神，弟子們都受到這種偉大精神的感化，所以把它列爲首章的。

孔子是我國最偉大的教育家，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他的誕辰，已被定爲「教師節」了。孔子以前，學在王官，所以尚書周官有「學古入官」的話，禮記曲禮有「宦學事師」的話，說文解字也還有「仕，學也」的古訓。（論語子夏所云，「仕優則學，學優則仕」當爲春秋末孔子以後的情形。）因爲古代物質文明未發達，以竹簡木牘，金版玉版代紙，以刀刻漆書代筆墨；簡牘繁重，金玉珍貴，刀刻漆書繁難，所以成書難，得書

難，藏書也不易。不但平民無從得書，即貴族也頗感困難。如韓宣子爲晉卿，聘魯，方得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是吳國貴公子，聘魯，方得聞詩之風雅頌。得書既難，又沒有私人講學的學者，學術自然不能普及了。孔子的先世，在宋國，固然是貴族；遷魯以後，則已爲平民。所以他要博覽羣書，不得不借助於南宮敬叔，得魯君的資助，方能遠適東周，向守藏室史老子設法。他是個反對貴族政治的人，（春秋譏世卿，已見上章。）又身受讀書的困難，所以學成之後，便抱着「有教無類」（見論語衛靈公）的宗旨，廣收門弟子，開私人講學之風。他的弟子，富如子貢，窮如顏淵、原憲，而且子路是卞之野人，子張是郕，顏涿聚是盜，所以東郭子惠有「夫子之門何其雜也」之歎。這樣不拘資格地並畜兼收，正可見他「有教無類」的精神，王官專守之學散於平民之間，私人講學之風開於春秋之末，是我國教育史上劃時代的大變化，而轉捩的樞紐全在孔子一人，其關係可謂重大極了！

這位大教育家的教育學說，教學方法，教學項目，教學精神，我們都可從論語這部書裏去分類研究。例如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見論語爲政）「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見論語衛靈公）可見他是主張「學」「思」並重，又恐思而不學之流於空疏誕妄了。而且他所謂「學」是兼重實踐的，不僅指死讀書本而言。故自「多學而識」的「下學」進至「一以貫之」的

「上達」而所謂「一以貫之」者，乃不外乎「忠恕」二字；這二字是包括「爲學」與「做人」說的。
 （論語憲問，孔子自言「下學而上達」，衛靈公孔子問子貢道：「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不能決。孔子又道：「非也，予一以貫之。」而里仁記曾子釋孔子「一以貫之」的話，又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他的教育學說，卽此已可見一斑了。至於教學方法，舉其榮榮大者言之，一爲注重啓發，一爲因材施教。論語述而記他的話道：「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這就是學記所謂「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和易以思的善喻之教也。和現代教育家所主張的「自學輔導主義」，「啓發式」……，有不約而同之妙。至於因材施教，在論語中尤多實例，如問「孝」，問「仁」，問「政」，問「士」……，所問雖同，但他的答話，却因人而異。尤其顯著的，先進篇裏記有一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這真是因材施教的實例啊！述而篇又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是書本的教育，「行」是行爲的教育，「忠、信」則更進而訓練他們的品性了。先進篇所說的「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雖不

能說他已有分科之制；而弟子們受了他的薰陶，發展其個性，各有特長，和他的教育，有這四種項目，則是可信的事實。最偉大的，還是上文所說「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他自己說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見論語述而）可以見他的「學不厭」；顏淵稱他「循循然善誘人」使學者「欲罷不能。」（見論語子罕）可以見他的「教不倦」；學不厭是「成己」，「立己」，「達己」的工夫；教不倦是「成物」，「立人」，「達人」的工夫。（成己成物，見禮記中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見論語雍也。）推而極之，直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偉大哉教育！偉大哉孔子！「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訟。」孔子的教人，不但不以言教，而且不以聲色化。（中庸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他完全着重在精神的感應，人格的感化。他們師生間情誼的密切，竟和父兄子弟一般。孔子於顏淵之喪，曾哭之至慟，曾有「天喪予」之歎，而且說：「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均見論語先進）他聽到子路在衛國戰死，甚至覆醢不忍食。（見禮記檀弓）這都是從心坎裏流出來的真情感。他老人家卒後，子貢曾謂夫子之喪，顏回，喪子路，皆若喪子而無服，故請同學們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亦見檀弓）弟子心喪三年既滿，治任將歸，向子貢告別時，尚相向而哭，皆至失聲；子貢又獨居墓旁三年，然後回去。（見孟子滕文公）這種真摯濃厚的師生情感，求之今世，真不可再得了啊！

論語論修養，都以實際的言行爲主；故立身處世之道，言之最詳；而其修養之理想的人格，則曰「君子」。其論道德，則以「仁」爲核心。仁者，人與人相處之道；以倫理關係之不同，乃分化爲忠、孝、信義等德目。仁以同情心爲出發點，（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就是這個道理。）故一切道德皆可以「忠恕」二字貫之。中庸所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的「君子之道」；大學所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求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的「絜矩之道」；亦不外乎忠恕二字。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見中庸）。「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見論語里仁）。「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便是「爲仁」之方。（論語雍也，子曰：『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也矣。』）所以我們如能細讀論語，便可獲得道德的明確觀念，修養的正當方法。

孔子的教育和道德，皆以「情感」爲主；他自己當然也是一個富於情感的，活潑潑地的人。論語中記孔子的日常生活極詳，具體的，如衣食細事，抽象的如他的神情態度，這些都是弟子們日常目觀的事實，和心中所有的印象，老老實實地記錄下來的。我們把零零碎碎的記錄綜合起來，與孔子自述語及弟子時人對孔子的評論，融會在一起，便會有一個活潑潑的孔子浮映在我們的腦際。孔子也是「人」，而且是一個

富於情感的「人」我們決不可把他當作泥塑木雕的偶像，看成出乎人情之外的「超人」之神。這樣，這部論語方是活的書；讀論語時，方不至味同嚼蠟；讀完後，方能得到真實的效用，而可以變化我們的氣質！

此外，如孔子的哲理談，本來不多，因為他是注重實踐，不尚空論的；如孔子的政治論，社會倫理說，頗多為當時政治社會對症而發的；但前者大都淵源入微；後者的根本精神，也有俟諸百世而不惑者。至其對於古人古事的批評，也可藉以考見他個人理想的一斑。我們都應分類鈔集，加以研究。——總之：「孔子個人有多少價值，論語便也連帶地有多少價值。」梁啓超這句話，是很對的。所以在十三經中，論語倒是極值得一讀，而且須趁先研讀的一部書！

第十一章 孝經與爾雅

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六經；周禮自劉歆以後，已與儀禮並列爲禮經；禮記及公羊傳、穀梁傳、左傳，雖本身都是傳記而非經，但也與六經有直接關係；至於論語、記述孔子的言行，亦爲儒門的寶典；這些書上幾章都已說過了。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所著錄的，除六經及論語外，尚有「孝經」一類，而以「爾雅」附之。現在孝經爾雅二書，都已列入十三經了。本章卽就此二書，分別加以說明；先述孝經次及爾雅。

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本無以「經」爲書名者；其稱曰「經」，乃後人的尊稱，並非原來的書名。上本有「經」字，只有「孝經」去了「經」字，便不成爲一書名。按漢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鄭玄孝經注序亦云：「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據此，則此書名曰「孝經」，是因爲「孝」是天經地義，並非因爲它是一部「經」書。但是因「孝」爲「天之經」而名曰「孝經」，其說仍嫌迂曲。我頗疑此書是後人所造，因爲要依託孔子而名之曰「經」，却沒有顧到和六經的書名兩樣。

蔡邕的明堂論曾引魏文侯的孝經傳。孝經傳雖已亡失，但因此可推見戰國初年已有孝經這部書，而

且已經爲人所研習，所重視了。呂氏春秋審微篇引孝經諸侯章，亦可爲戰國時已有孝經之證。後儒以緯書有「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的話（見孝經鉤命訣），遂謂孔子所創作的只有這兩部書。史晨奉祀孔子廟碑云：「乃作春秋，復演孝經。」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鄭玄六藝論又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人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可見漢人已把孝經的地位抬得很高。但是孝經第一章開首便說：「仲尼居，曾子侍。」豈有自己作書，稱其弟子曰「子」的道理。卽此一句，已可證明此書決非孔子所作了。如其是孔子弟子所記，也不應稱孔子爲「仲尼」，反稱他的弟子爲「曾子」。所以此書的作者，不但不是孔子，而且不是孔子及門的弟子。

呂維祺孝經或問云：「孝經何爲而作也？曰：爲闡發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作也。」又曰：「孝經論孝，大抵從立身行道德教政治上說，非徒爲曾子而言，蓋爲天下後世之君天下者言也。」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則謂孔子與曾子的問答，是假設之以明孝道與孝治之義。呂兪二氏雖說此書不僅爲曾子而作，問答是假設的，但言外之意仍認爲是孔子作的。朱子孝經刊誤引程迥之答朱子書及黃震的黃氏日鈔都記南宋時人汪應辰的話，則疑孝經多出後人附會。紀昀四庫書目提要論孝經道：

「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卽指戴德之大戴禮記，戴聖之小戴禮記）爲近，要爲七十子之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采入

一百三十一篇中，（漢志禮類有記百三十一篇。河間獻王名德，景帝子，德得記百三十一篇，見隋書經籍志。）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後儒遂以不類繫辭、論語繩之，亦有由矣。」

所以孝經這部書的地位，至多祇能等於禮記中的一篇，與論語平列，尙且不配，何況六經？

孝經在漢代已有兩種本子，故漢志著錄有「孝經古孔氏一篇」自注云，「二十一章」；「孝經一篇」自注云，「十八章」。古文本爲孔安國所注，據說亦出於孔宅壁中，據隋書經籍志，已亡於梁末。今文本爲鄭玄所注，經文今存。鄭注亦亡，清嚴可均有輯本，現存十三經中的，經文採用今文本，注是唐玄宗的御注。至於隋末王劭所訪得的古文孝經，由劉炫撰序、述疏的，卽爲劉炫所偽造。（亦見隋書經籍志。）清代汪翼滄得自日本的古文孝經，也是偽書。十三經中今文本的十八章篇目如下：

1. 開宗明義章
2. 天子章
3. 諸侯章
4. 卿大夫章
5. 士章
6. 庶人章
7. 三才章
8. 孝治章
9. 聖治章
10. 記孝行章
11. 五刑章
12. 廣要道章
13. 廣玉德章
14. 廣揚名章
15. 諫諍章
16. 感應章
17. 事君章
18. 喪親章

據漢志所云，西漢經生所傳今文孝經，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且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故親生之膝下」(按皆孝經聖治章語)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可見今文本與古文本的文字句讀不同。古文孝經不但文字與句讀和今文本不同，章數也比今文本多。古文本分三才章爲二，聖治章爲三，又多閨門一章，故有二十二章。按今文孝經十八章中，最長的是聖治章，共二百八十八字；最短的是五刑章，僅三十七字，而且是短的多，長的少。三才章的原文如下：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試問：我們如要把它分作二章，從那裏分起？朱子孝經刊誤，又據古文本，刪去二百二十三字，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這原和他分大學爲經一章，傳十章的法兒一樣。老實說，也是多此一舉。元吳澄的孝經定本，又改用今文本，而分之爲經一章，傳十二章，那更可不必論了。因爲孝經本是寥寥短篇，用不着再加割裂，而且割裂古書，也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

孝經以「孝」爲「至德要道」，「天經地義」，以爲「人之行莫大於孝」，「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一切道德，一切人事，都可以一「孝」字括之。論語記有子之言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

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孔門原有以「孝」爲本的道德論。但所謂「孝」是「爲仁」之本者，是「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的意思，是從「孝」做起的意思，不是用一個「孝」字來包括一切德目。可以包括一切德目的，是「仁」，不是「孝」。我們只須細讀論語，便可以看出來。孝經所論，當爲曾子以後某一派儒家後學的主張。但其中也頗有可采的話。如諫諍章所說：『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現在我國儘有許多不能「戒之在得」的老翁，趁國難的機會，升官發財的；他們的子女若不能據理力爭，坐視老父之陷於不義，那便是大大的不孝了！至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這是指平時說的，所以說是「孝之始」。如其當執干戈以衛社稷的時候，則又當別論。我以爲孝經論「孝」不如禮記祭義所記曾子之言。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這不是明白得多了嗎？

漢志於孝經類附著爾雅，凡三卷，二十篇。經典釋文敍錄云：

「爾雅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實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可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按張揖，魏人，進廣雅表云：

「周公著爾雅一篇，（疑即指釋文所云釋詁。）今俗所傳三篇，（指即漢志所云三卷。）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疑莫能明也……」

揚雄方言謂爾雅爲孔子門徒解釋六藝而作，王充論衡同，歐陽修詩本義謂爾雅係學詩者纂集博士解詁而成，高承事物記原同。永樂大典引曹粹中放齋詩說曰：「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紀昀四庫書目提要亦謂爾雅乃錄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自爲一書，所采者不僅經義，并旁及楚辭、莊子、穆天子傳、管子、呂氏春秋、尸子、國語諸書，蓋亦方言急就之流；其成書亦當在毛亨以後，武帝以前，周公孔子皆爲依託之詞，且非纂自一手云云。可見爾雅爲周公孔子所作的話，是不可靠的了。或謂大戴記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哀公學「爾雅」，爲此書成於孔子以前之證。孔子教哀公學爾雅的事，究竟可靠與否，已不可知；而且「爾雅」二字是否即指爾雅一書，也還是疑問。「爾」通「邇」，「雅」者雅言，別於方言俚語而言；漢志序尚書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漢書儒林傳序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爾雅」二字，便非書名了。爾雅本以今語釋古語，故取此名，但古籍中「爾雅」二字連用者甚多，就是今人常語，也還有「溫文爾雅」等語，都不是指爾雅這一部書而言的。所以梁啓超二戴禮記解題附論爾雅，

以爲「不過秦漢間經師詁經之文，好事者輯爲類書，以便參檢」云云，並不是臆度之詞；比較地可以相信。今本爾雅共計十九篇，而漢志著錄的有二十篇。近人葉德輝以爲漢志蓋合序篇言之。序篇已亡，詩正義中嘗引之，可以爲爾雅有序篇之證。今存十九篇的篇目，茲列舉之如下：

1. 釋詁
2. 釋言
3. 釋訓
4. 釋親
5. 釋宮
6. 釋器
7. 釋樂
8. 釋天
9. 釋地
10. 釋丘
11. 釋山
12. 釋水
13. 釋草
14. 釋木
15. 釋蟲
16. 釋魚
17. 釋鳥
18. 釋獸
19. 釋畜

爾雅，可以說是一部我國最古的分類編撰的字書。除前三編釋古代的詞語，第四篇釋古代親屬的稱謂，爲比較抽象的之外，釋宮以下，則都是釋實物名稱的。

梁啓超認爲爾雅本爲記百三十一篇中的一篇，或數篇。因爲張揖廣雅表有「爾雅一篇，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的話。清臧庸輯有爾雅古注，其序中曾列舉漢人引爾雅之文而稱禮記的實例。如班固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其文見於爾雅釋親篇；應劭風俗通聲音篇引禮記樂記，其文亦見於爾雅釋樂篇；何休公羊解詁，宣公十二年注引禮記，其文亦見於爾雅釋水篇；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又是爾雅本在禮記中的明證。後來劉歆欲立古文學，嘗徵募能爲爾雅者千餘人，講論庭中（見漢書楚元王傳）於是爾雅一書，聲價陡增，也躋於經書之列了。

爾雅原是一部備查的書；我們如果要細讀它，必致閱未終篇，便昏昏欲睡，如果要熟讀它，也是事實上不可能的；即使有人能熟讀，也是徒耗腦力，難能而不可貴的。爲求時間精力的經濟計，此書簡直不值得一讀。但是我們如能略加翻閱，懂得它分類的大概，檢查的方法，則於閱讀古書時，却可以得些幫助。例如首篇釋詁第一句云：『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便是說，這許多詞，都可作「始」字解。釋言的「還復、返也」，「駟、遽、傳也」之類；釋訓的「明明、斤斤、察也」，「穆穆、肅肅、敬也」之類，也和釋詁差不多。釋親則於「宗族」，「母黨」，「妻黨」，「婚姻」的稱謂，都解釋得明明白白，就如釋宮以下各篇，對於古代房屋，各部的名稱，山川鳥獸虫魚草木的物名，有與現代不同，爲一般人所不能領會的，一查此書，便可瞭然。

現在還有些好古之士，不但喜以甲子紀年，且喜歡用「闕逢困敦」一類代用之詞，我們見了，更不知所謂；如其一檢爾雅釋天，便可列成一個便於檢查的簡明的表：

(一) 歲陽——太歲在十干，有十個不同的名稱，叫做「歲陽」

甲——「闕逢」 乙——「旃蒙」 丙——「柔兆」 丁——「強圉」 戊——「箸雍」

己——「屠維」 庚——「上章」 辛——「重光」 壬——「玄默」 癸——「昭陽」

(二) 歲陰——太歲在十二支，也有十二個不同的名稱，叫做「歲陰」

子——「困敦」 丑——「赤奮若」 寅——「攝提格」 卯——「單闕」 辰——「執徐」 巳——「大荒落」 午——「敦牂」 未——「協洽」 申——「涇灘」 酉——「作噩」 戌——「闔茂」 亥——「大淵獻」

因爲它們就是天干地支的代用詞，所以史記、曆書、司馬貞索隱引爾雅釋天簡直說：「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歲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甲、酉、戌、亥，十二支是也。」

這許多奇怪的名稱，我們看了，竟有些無從索解。注疏爾雅的人，如郭璞注，邢昺疏，邵晉涵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及所引李巡的解釋，雖然也各加以訓釋，但仍是望文生義。例如：

闕逢——「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闕逢。」

旃蒙——「言萬物遏蒙甲而出，故曰旃蒙。」

柔兆——「言萬物皆垂枝布葉，故曰柔兆。」

強圉——「言萬物皆剛盛未通，故曰強圉。」

箸雍——「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箸雍。」

屠維——「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

上章——「言陰菊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

重光——「言萬物皆成熟，其光煌煌，故曰重光。」

玄默——「言物終而幽翳也。」

昭陽——「言陽氣始萌，茲物含生，故曰昭陽。」

困敦——「言陽氣皆混，萬物芽孽，故曰困敦。」

赤奮若——「言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故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迅也；若，順也。」

攝提格——「言萬物皆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

單闕——「言陽氣推萬物而出，故曰單闕。單，盡也；闕，止也。」

執徐——「言伏蟄之物，皆振舒而出，故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

大荒落——「言萬物皆熾茂而大出，霍然落落，故曰大荒落。」

敦牂——「言萬物皆茂壯，猗那其枝，故曰敦牂。敦，茂也；牂，壯也。」

協洽——「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故曰協洽。」

涒灘——「言萬物皆循修其精氣，故曰涒灘。」

作噩——『言萬物墜落，故曰作鄂。作，索也；鄂，落也。』（噩一作鄂。）

闕茂——『言萬物皆蔽冒，故曰闕茂。闕，蔽也；茂，冒也。』

大淵獻——『言萬物落於亥，大小深藏屈近陽，故曰淵獻。淵，藏也；獻，近也。』

我們看了這些解釋，仍是莫名其妙。其實十干十二支的原名，已是費解，又化出這十二個歲陽歲陰的干支代用詞，自然更不能使我們了解了。此外，還有十二個月名，也見於爾雅釋天，列舉如下：

正月——『陬月。』 二月——『如月。』 三月——『寘月。』 四月——『余月。』

五月——『皋月。』 六月——『且月。』 七月——『相月。』 八月——『壯月。』

九月——『玄月。』 十月——『陽月。』 十一月——『辜月。』 十二月——『塗月。』

這些月名的解釋，不復聲述。離騷云：『攝提員於孟陬。』就是屈原說他自己生於寅年的正月。宋之間詩云：『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即以『陽月』指十月。所以這些歲月的代用詞，雖然沒有什麼意義，有時候却也有些用處。

爾雅無今文古文之分。因它的成書，是在叔孫通、毛亨以後，（已見上文。）似乎當然是今文。實際上，却是一部助經古文學張目的書。清孫星衍爾雅釋地四篇後敘說：『爾雅所記則皆周官之事。』據陳啓源毛

詩稽古編所考，爾雅所記，多同詩的毛傳。康有爲云：『爾雅訓詁以毛詩周官爲主；釋山，則有五嶽（『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與周官合。（春官宗伯有「祭祀稷五祀五嶽」語。）與堯典（按見今舜典。岱宗、南岳、西岳、北岳，僅四岳。）王制（王制與堯典同。）異釋地，九州與禹貢異。（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隴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禹貢九州，爲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梁州、雍州。所說地位亦與爾雅不同。）與周官略同。（周官九州，爲揚州、荊州、豫州、青州、兗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見夏官職方氏。）釋樂與周官大司樂同。釋天，祭名與王制異，與毛詩周官合。（按爾雅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王制：『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官則曰「春禘，夏禴，秋嘗，冬烝，見春官宗伯。」若其訓詁，全爲毛詩，』可見它雖無古文經之名，實爲古文經說的總匯。

漢志在爾雅之後，又附有小雅一篇。宋祁曰：『「小」字下一本有「爾」字！按今孔叢子中有小爾雅一篇。錢大昕曰：李善文選注，引小爾雅，皆作「小雅」。此書依附爾雅而作，本名小雅。後人僞造孔叢，以此篇竄入，因有小爾雅之名，失其舊矣。一本「爾」字，亦俗儒增入，不可據。』今存小爾雅係從僞孔叢子中錄出，已非漢志著錄的小雅原書了。魏張揖有廣雅，宋陸佃有埤雅，都是摹仿爾雅作的，論其價值，却都是後來

居上呢！

總之，孝經和爾雅，都只能說是六經的附庸；漢志著錄於六藝略中，也是附錄之意。後來因此列爲十三經之二，地位就抬高了。以它們本身的價值說，還不及論語哩！

第十三章 孟子

十三經未了的一部是孟子。這一部書，漢書藝文志並不列入六藝略中。凡是「經」以及和經有直接關係的，無論是先秦古籍，是西漢經生的作品，漢志都列入六藝略；孟子却與荀子（漢志作孫卿子）之類，同著錄於諸子略；儒家中，可見劉歆、班固都認孟子爲一部「子」，不是一部「經」。《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都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孟子也仍列入「子部」。可見在北宋以前，孟子還不算是一部「經」。南宋孝宗時，朱子把本在小戴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二篇特別提了出來，與漢志列入「六藝」的論語，列入「諸子」的孟子，並列爲「四書」。他宗程子之說，以爲大學是「初學入德之門」，是曾子所述，子思的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和記孔子言行的論語，記孟子言論的孟子，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脈相承的「道統」所在；這在第一章裏已經提到過了。孟子的自子部升入經部，列爲十三經之一，便是由此。

漢志諸子略儒家有「孟子十一篇」。現存十三經中的孟子却只有七篇，較漢志著錄的少了四篇。這是什麼緣故？漢趙岐所注，亦僅七篇，與今本篇數相同。其孟子題辭云：「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同仿）而作也。」風俗通窮通篇也說：「作書

中外十一篇。』可見七篇是「中」，四篇是「外」。（周秦諸子之書，有分「內篇」「外篇」者，今存莊子還是如此。）漢志是把七篇和四篇合計的，所以有十一篇。現在四篇已亡，所以全書僅存七篇了。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則此四篇外書，南宋以前就都亡了。孫奕履齋示兒編云：『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似乎南宋人還有見到的。趙歧疑這四篇外書，「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作。」故作孟子章句時，僅注內書七篇。此後傳孟子的，都以趙氏章句爲本，外書四篇，遂致亡失。南宋去東漢趙氏時，已有一千多年，不應在館閣中還有完全的四篇外書。而且當時在館閣中的文人學士，何以也沒有目覩這四篇外書而詳細說及的呢？新喻謝氏所藏的性善辯一帙，劉昌詩似乎曾目覩過。隋書經籍志有梁綦毋邃的孟子注九卷。別的孟子都只有七卷，他的孟子注獨有九卷，似乎所失的外書四篇，梁時曾得其二，至南宋時，又僅存劉氏所見，謝氏所藏的一篇性善辯了。綦母氏的孟子注，李善注文選還引用它，似乎在唐代還流行着。那末，其中有無外書，何以唐代沒有人說及呢？按王充論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下面並沒有「辯」字。所以清翟灝的孟子考異認爲這四篇的篇名應當是（一）性善，（二）辯文，（三）說孝經，（四）爲政。而且孝

經本另有一書，孟子篇名，似亦不當和它完全雷同。則新喻謝氏所藏的性善辯，或者又是後人依仿那本出後人依託的四篇外書而作，爲偽書之偽書，亦未可知了。到了明末，姚士粦等又傳孟子外書四篇，說是熙時子注，友人吳騫刻板印行，前面有馬廷鸞的序。熙時子相傳就是劉貢父。（宋劉敞字貢父。）這部書，丁杰已列條辯駁，證明爲偽中之偽，更沒有值得討論的價值了。總之，我們要讀孟子，對於這四篇外書，竟可以置之不理。

孟子七篇的篇目，和論語二十篇的篇目一樣，是無義的，是取每篇首章的第一句或第二句的二字或三字爲題的。茲列舉之如下：

1. 梁惠王——首章首句爲「孟子見梁惠王。」
2. 公孫丑——首章首句爲「公孫丑問曰。」
3. 滕文公——首章首句爲「滕文公爲世子。」
4. 離婁——首章首句爲「孟子曰，離婁之明。」
5. 萬章——首章首句爲「萬章問曰。」
6. 告子——首章首句爲「告子曰。」

7. 盡心——首章首二句爲「孟子曰，盡其心者。」

孟子這部書的體裁，確和莊子、墨子、荀子……不同，而反類似論語。因爲一般的子書都是一篇篇的長篇大論；孟子中雖也有長篇，但是記問答的居大多數，而且有僅記幾句話的，恰和論語的體例相像，和其他的子書不同。

史記孟子傳（與荀卿同傳）云：「孟軻所如（往也）皆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亦云：「……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據此，則七篇之書是孟子自己作的了。但是孟子中於孟子所曾晤見的諸君，都舉其諡，如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魯平公……不應皆先孟子而死；而且此書的體裁極似論語，所以一般人疑是他的門弟子所記錄編纂，和論語一樣。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則仍以七篇爲孟子自作，并云：「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又云：「卒後爲門人所敍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焦循孟子正義亦云：「……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魏、鄒、滕諸君所言，景子、莊暴、淳于髡、周霄、景春、宋慳、宋句踐、夷之、陳相、貉稽、戴盈之、戴不勝、儲子、沈同、陳賈、慎子、王驥等相問答，蓋亦

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矣。』我以為弟子記錄其師的言論，並沒有必須兼記其容貌、態度、日常生活的必要；孟子生當戰國，已在老子、墨子等立論著書之後，如其自己著書，似不至瑣瑣屑屑地把片言隻語都記下來，而不做成長篇的議論；就是記與弟子時人問答的各章，都自稱孟子，也不像自己動筆的樣子；這七篇中，或者有他自己寫的文章，驛入其中，大部分必是他的弟子記錄的。

讀書貴乎論世。我們讀孟子，孟子的為人如何，先得知道一個大概。我們讀論語，要知道孔子的生平，可以參看史記的孔子世家。雖然所記的事實，也有不可靠的，（如欲應公山弗擾及佛肸之召之類。）也有不足取的，（如孔子能識墳羊之類。）但記敘得比較詳細。所以孔子的名字，（名丘，字仲尼。）里居，（魯昌平鄉陬邑。）世系，（如其先祖弗父何讓國，正考父仕宋，孔防叔奔魯，以及其父叔梁紇娶顏氏而生孔子。）履歷，（如仕魯由中都宰至司寇，及周遊列國，退修六經及教授弟子等。）都可從孔子世家中考見之。史記也有孟子的傳，但比孔子世家要略得多了。據史記，孟子名軻，鄒人，鄒是小國，即春秋時之邾國；他的字是什麼，趙岐孟子題辭已說「字則未聞」了。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也說：『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

「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按王史二氏所云，則孟子之字，只能闕疑了。孔叢子是王肅偽造以成其聖證論的，不足為據。傳玄生於司馬遷、趙岐之後，又何以知之？至於孟子的出處事跡，當以見於本書者為可信。我們如果能細加細釋，排列先後，參考史記的傳、趙岐的題辭，以及閻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狄子奇的孟子編年等書，很可以寫成一篇孟子傳。

史記孟子傳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司馬貞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如王劭所說，則孟子是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了。漢志諸子略儒家，「孟子十一篇。」班固自注云：「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按列女傳也說：「孟子旦夕勤學不輟，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風俗通窮通篇也說：「孟子受業於子思。」兩漢學者似都以孟子為子思的及門弟子。孟子究竟是子思的弟子呢？還是子思弟子的弟子呢？這倒比較地可以考證。據史記孔子世家，子思活了六十二歲。子思是孔子的孫子，伯魚的兒子。孔子死於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比孔子先死三年，在敬王三十九年。子思最遲生在子思死的那一年，即便是遺腹子，也須生於子思死的第二年，敬王四十年。從這時算起，子思當死在威烈王八九年的時候。孟子生於烈王四年，上距子思之卒，已四十七年了。但是從孟子本書中看來，子思曾為魯繆公所敬禮，而繆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故或謂

史記「子思年六十二」的「六」字，是「八」字之誤。但即使子思活至八十二歲，孟子也不及親受業於子思。（按史記魯世家，魯哀公在位二十七年，悼公繼立，在位三十七年，元公繼立，在位二十一年，穆公繼之。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子思生於孔子卒之前三年，而及見魯穆公，即使死在穆公初年，年壽也不止六十二歲。）因為假定子思八十二歲而卒，當在穆公十年左右。孟子曾見魯平公，（見本書。）從魯平公元年到穆公十年，已有八十三四年了。（穆公在位三十三年，共公繼立，在位二十二年，康公繼立，在位九年，景公繼立，在位二十九年；景公卒後，平公繼立。）就使根據史記的六國表來推算，魯穆公元年，當威烈王九年，魏惠王（即孟子之梁惠王。）元年當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孟子於魏惠王三十五年遊魏，上距穆公元年，也已七十三年。那末，如果孟子曾親受於子思，也必以不滿十歲的孩子去做年逾八十的大儒的弟子，以人情推度起來，似乎也說不通。而且孟子書中，對於這位大名鼎鼎的老師，何以不曾明明白白地說及自己和他的師生關係呢？所以我認為倒是史記「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的話，比較可靠。

孟子的學說，以他的「性善論」為其根據。孟子主「性善」和荀子主「性惡」正是相反的兩派。孟子主張「性善」故其教人在「盡性」而復其善；荀子主張「性惡」故其教人在「化性」「積善」前者是獎掖的，誘導的教育法；後者是督責的，約束的教育法。這在周秦諸子（本叢書第二輯第五冊）中已

說過了。他的「性善論」的根據，以及他和同時人的辯論，都可從孟子本書裏找出來。例如公孫丑篇有這樣一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我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同燃）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信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因爲這四種善端是人人本性所同具，所以說「性」是「善」的。所以他認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認爲「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那末，天下爲什麼有許多惡人呢？孟子以爲「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如「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常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所謂「幾希」之別，卽在人性中本有善端。所以孩提之童都各有他們愛親敬長的「良知」「良能。」因爲後天環境的薰染，外物的誘惑，人事的激蕩，才把這固有的「善端」「良知良能」旦旦而伐，反覆桎亡，以致蕩然無存了。他又用麩麥來比喻，

以爲麩麥的種子原是相同，而地有肥磽，雨露人事有不齊，所以收穫不同。「性善論」是孟子學說的根據，散見各篇中者很多，我們得把它們好好地收集起來，整理起來，加以一番研究。

孔子論政，也主張先「庶」，次「富」，後「教」。（見論語子路子適衛章。）孟子則言之更詳。孟子所主張的「仁政」都是先求解決「民生問題」，然後施以教育。所以他告梁惠王，直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對齊宣王說的一段話，更爲詳盡。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同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終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富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見梁惠王。）

無恆產，則生活不安定，生活不安定，則小而欺詐偷竊，大而殺人越貨，必至無所不爲。不先替人民打算，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無論以刑賞去懲治，以教育去感化，都是不能收效的。所以他主張：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對梁惠王語略同，均見梁惠王。）

那時候還是純粹的農業生產時代，所以他的「民生主義」完全從耕稼、畜牧、蠶桑着眼。在幾千年前，談政治已注意到民生和經濟思想的前途，眼光的遠大，是值得佩服的。他這種主張，並不是徒發空論的，是有他理想的辦法的。他的「制民之產」的辦法，就是類似「均產制」的「井田制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八家共耕公田，即以公田的收入爲國家取於人民的賦稅，這種收稅的制度叫做「助」。他以爲比較「貢」、「徹」二法都來得好。（見滕文公）這種制度，古代究竟有沒有試行過？究竟在現代人口稠密的時代，或多山川的地方，可否試行？固然都是疑問。但在他那時代，在北方平原地帶，我們不能不承認它是一種比較合於事實的理想政策。他又曾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見盡心）他告齊宣王，以爲國人皆曰賢，然後可以察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可以察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可以察而殺之。（見梁惠王）他答萬章，論到堯禪舜，舜禪禹，禹獨不傳益而傳其子啓，是由於天意，而天意的表現，却全在民意的向背。（見萬章）我們雖不能因此便把他拉扯到「民權主義」上去，但在數千年以前的政論家，已知民之可貴，民意之可尊重，不是很難得的嗎？——所以孟子的政治理論，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孟子裏的道德論，修養談，和論語的一樣，大部分是到現在還有價值的。孔子以「仁」爲一切道德的

總綱；孟子卻於「仁」字之外，加上一個「義」字。他以爲「仁」是「人之安宅」，「天下之廣居」，「義」是「人之正路」，「天下之達道」，所以說：『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見盡心。）孟子的理想人格也是「君子」，可是「君子」之外，還有所謂「大人」。例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見離婁。）『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見離婁。）『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見告子。）可是「君子」「大人」這兩個名詞，有時是指在上位者而言（如「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說大人則藐之」之類。在論語裏也是如此。我們閱讀時必須把它們辨認清楚。孟子的修養方法，最重一個「心」。所以說「養心」（盡心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存心」（離婁云：『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盡心」（盡心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求其放心」（告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動心」（公孫丑篇首章卽論「不動心」之道在「知言」「養氣」。）宋儒的理學以「心」「性」爲研究修養的對象，是從孟子出來的。

孟子於出處辭讓之間，最講究一個「義」字。義者，宜也。出處去就，辭讓取予，都應當先問義不義；所謂義不義者，就是應該不應該，合理不合理。即使眼前富貴，唾手可得，如其是不義的，便不應該「就」，不應該「取」。不但去就取予，甚至於生死，也當以義爲權衡。所以他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見告子）這種「舍生取義」的精神，和論語裏孔子所說的「殺身成仁」同樣偉大；宋末的文天祥便得力在這兩句話，在今日尤應加以提倡！

論語和孟子，雖然同是記聖賢的言行的，而文章的體制和風格不同。論語是簡樸的記述；孟子卻有波瀾壯闊、風雲變幻的長篇議論。這正和老子以古樸勝，莊子以奇肆勝一般。我頗疑心是春秋時代和戰國時代的作風不同，至於孔子和孟子氣象之不同，也可以從論語孟子這二部書裏看出來。孔子的氣象是中正和平的，孟子的氣象是剛健雄偉的；孔子的言論是含蓄的，光燄內斂的，孟子的言論是暢快的，光芒四射的。所以熟讀孟子，在文章方面，尤其是議論文方面，有很大的幫助。

第十四章 六經的傳授

十三經的內容大概。既分述如上，茲當進而述經學之略史。十三經是南宋以後方纔完成的經部的叢書，所以述古代的經學，當以六經的傳授爲主。陶潛聖賢羣輔錄云：『顏氏傳書，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疏通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絜靜精微之儒。』陶潛所舉的六家傳經之儒，皆見於韓非子的顯學篇。（顯學篇云：『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但他們的名字傳授，已無可考。孔門傳經之儒，現可考見者，當首推卜子夏。經典釋文敍錄於周易類首列子夏易傳三卷，自注云：『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按此易傳或云爲漢人 韓嬰字子夏即傳韓詩者所作。）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亦見釋文序錄。）春秋，則公羊高受之於子夏。（見釋文序錄自注。）穀梁赤亦爲子夏門人。（見釋文序錄自注引風俗通。）儀禮喪服亦有子夏傳。（今存儀禮中。）而論語鄭玄亦謂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故後漢徐防上疏有「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的話。宋洪邁容齋隨筆也說：『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朱彝尊經義考說孔

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尚有受易的子木（商瞿）習書的子開（漆雕開）述孝經的子輿（曾參）問樂的子貢（端木賜）以及仲弓（冉雍）閔子騫（閔損）言游（言偃，字子游）的撰論語，孺悲的傳士喪禮；但是傳授羣經的，終當首推子夏。

孔子論學本是「學」與「思」二者並重的。論語爲政：『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衛靈公：『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中庸也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博，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博學」「審問」可以說是「學」；「慎思」「明辨」可以說是「思」；前者是「道問學」的工夫，後者是「尊德性」的工夫。（中庸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之語。）這兩種工夫的終局目的，還在乎「篤行。」這本是各方顧到，不偏不倚的。孔門弟子，則就其個性，各展所長。於是有聞「一貫之道」的曾子（論語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有兼傳六藝的子夏，所謂「傳道」「傳經」分道揚鑣了。戰國時，儒家鉅子，首推孟軻、荀况。孟子，可以說他是「傳道之儒」，繼承曾子一派的；荀子，可以說他是「傳經之儒」，繼承子夏一派的。釋文敘錄謂毛詩，一云孫卿子（即荀子）傳魯人大毛公，則毛詩出自荀子；漢書楚元王傳謂元王劉交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受詩於浮丘伯，而伯爲孫卿之門人。魯詩爲申公所傳，則亦出於荀子。韓詩今存外傳，其中引荀子以說詩者凡四十四則，是韓詩亦與荀子合。釋文序錄又謂左丘明作傳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鐸椒，椒傳虞卿，虞卿傳荀卿，則左傳亦傳於荀子。漢書儒林傳謂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申公，而申公爲荀子再傳弟子，則穀梁傳亦荀子所傳。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載荀子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禮記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諸篇，載荀子禮論、樂論二篇文。荀子論學論政，本是注重「禮教」「禮治」的，其深於禮，不言可知。劉向又稱荀子善爲易，其義略見非相、大略二篇中。可見傳經之功，荀子最大了。（參閱汪中述學荀子通論。）

秦始皇統一六國，廢封建，立郡縣，爲我國政治史上劃時代的改革。因爲當時的儒生，如淳于越等，援古證今，反對他這種重大劇烈的改革，故從丞相李斯之議，欲根絕儒生是古非今的議論，於是下焚禁詩書之令。本書第二章裏已將這事的原委評述過了。始皇的焚禁，雖然不曾使六經之傳，根斷株絕，但所受打擊終是極大的。漢惠帝四年，始明令廢除挾書之禁，於是傳經之儒，先後繼出，經學乃特盛於西漢。史記儒林傳說：「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嬰；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西漢傳經之儒，這幾個人可以說是領袖。

申培，魯人。因為他是西漢初的老儒，故稱之曰申公。漢高祖過魯時，申公就以弟子從師晉見了。呂后時，遊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後郢封楚王，延申公為其子戊之傅。及戊嗣立，乃嘗靡申公，申公恥之，乃歸魯，家居教授。嘗為詩訓故。（即漢志六藝略詩類中的魯故，今已亡。）後因其弟子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荐於景帝，乃以安車駟馬迎之，為大中大夫。申公時已八十多歲了。因「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之對，不為景帝所喜；而竇太后好黃老，不喜儒術，趙綰、王臧皆得罪下獄自殺；申公亦以疾免歸。因為申公是魯人，所以他所傳的一派詩經，叫做「魯詩」。轅固、齊人尊稱之，故曰轅固生。轅固生亦治詩，景帝時為博士。嘗與黃生辯「湯武非受命」的問題於景帝之前。竇太后召轅固生問老子。固輕視老子，以為「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罰令入圈刺豕。後又嘗為清河王太傅，以病免。武帝時，復與公孫弘等以賢良徵。固嘗誡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時固年已九十餘，終以老罷歸。因為他是齊人，所以他所傳的一派詩經，叫做「齊詩」。韓嬰，燕人，時稱韓生，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嬰也研究詩經，著有內傳、外傳。這一派詩經，卻不稱為「燕詩」而稱為韓詩。——以上三派，關於詩的著述，漢志著錄的，有魯故、魯說、齊后氏故、（后倉）齊孫氏故、齊后氏傳、齊孫氏傳、齊雜記、韓故、韓內傳、韓外傳。現存的只有韓詩外傳一種，其餘都已亡失了。（近人楊樹達謂內傳存今本外傳中，見所著漢書補注補正。）

伏生，名勝，濟南人，本爲秦博士。以今文尚書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鼂錯往伏生處受尚書的故事，第五章裏已說過了。伏生所作尚書大傳，今已殘缺。漢志尚書類著錄的「傳四十一篇」，不知是否指伏生的尚書大傳。伏生的弟子，以濟南人張生及千乘人歐陽生（字和伯）爲最著。張生曾爲博士，又傳夏侯都尉；都尉傳其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傳其從兄子建。勝官至長信少府，建官至太子太傅。時稱勝爲大夏侯，建爲小夏侯。歐陽生以尚書授倪寬。寬嘗爲武帝語經學，官至御史大夫。寬後以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其曾孫歐陽高，字子陽，爲博士。夏侯建既傳其從父勝之尚書，又從歐陽高學，其章句詁訓頗與勝相出入。勝斥建爲「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謂勝「爲學疏略，難於應敵」。由是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漢志所錄尚書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歐陽說義，大小夏侯解故，就是他們這兩派關於尚書的著作，並已亡失。

士禮十七篇（即今存儀禮，詳見第六章）爲漢初魯人高堂生（字伯）所傳。而徐生善爲頌，文帝時以頌爲禮官大夫。「頌」古「容」字，「禮容」謂行禮時之儀容。徐氏世世爲禮官，但不能精通經義。瑕丘人蕭奮亦以治禮，至淮陽太守。奮傳東海人孟卿，孟卿傳齊人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曲臺爲當時講習射禮之處。）倉授梁人戴德、戴聖，沛人慶普。普字孝公，爲東平王太傅。德號大戴，官至信都太傅。

輯有大戴禮記，今已殘。聖號小戴，以博士官至九江太守，輯有小戴禮記，今存十三經中。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易自魯人商瞿受之孔子，六傳而至田何。何字子莊，爲戰國齊田氏族。漢高祖徙六國豪家於關中，田何被徙至杜陵，號杜田生。又再傳而至楊何，字叔元，淄川人，官至大中大夫。田何弟子丁寬，字子襄，梁人。學成歸，何謂其門人曰：『易已東矣。』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故號丁將軍。寬授同郡田王孫，曾爲博士。田王孫之弟子，最著者三人。一爲施讎，字長卿，沛人，宣帝時爲博士。其弟子張禹，官至丞相，封安昌侯。禹弟子淮陽人彭宣，官至大司空。一爲孟喜，亦字長卿，東海人，曾官曲臺署長。喜嘗詐言其師田王孫將死時，獨以易陰陽災變之書授之，以誇耀於衆。同門梁丘賀曰：『田生死時，僅施讎侍側，喜方歸東海，安得有此事？』喜終以改師法，不得爲博士。而其弟子東海人白光，沛人翟牧，並爲博士。一爲梁丘賀，字長翁，琅玕人，宣帝時，官至大中大夫。給事中。賀再傳弟子中有平陵人士孫張，沛人鄧彭祖，齊人衡成，皆以易著。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家有張彭之學，孟家有翟白之學，梁丘家有士孫、鄧、衡之學。又有梁人焦贛，字延壽，治易，自謂得孟喜之傳，而白光翟牧皆不肯認爲同門。焦氏之易，傳之頓丘人京房。房字君明，本性李，推律自定爲京氏。著有京氏易傳。房治易，喜言災異。宣帝時，得幸，官至魏太守，後爲石顯所譖，被誅。由是易有京氏之學。漢志著錄諸家關於易之著

作，今並亡。僅存焦氏易林。

董仲舒，廣川人，治公羊春秋。史稱其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仲舒，景帝時爲博士；武帝時舉賢良第一，嘗爲江都相，膠西相。所著春秋繁露猶存。胡毋生者，字子都，齊人，亦治公羊春秋。仲舒嘗稱之。胡毋生，景帝時爲博士，年老，歸教於齊。傳其學者，有魯人眭孟爲公羊大師。孟之弟子，最著者爲東海人嚴彭祖，字公子，薛人。顏安樂，字公孫。孟爲之語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宣帝時爲博士，官至太子太傅。或勸以少自曲抑，以得貴人之助，可至宰相。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委曲相從，苟求富貴？』安樂爲眭孟弟子，家貧力學，後官齊郡太守丞，爲仇家所殺。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申公。武帝時與董仲舒齊名。上使與仲舒議春秋。仲舒善持論，而江公呐於口，於是上尊公羊，而穀梁寢微。其孫宣帝時，曾爲博士。其後尹更始以治穀梁爲議郎，宣帝甘露元年，與諸儒評公羊穀梁同異於殿中，太子太傅蕭望之等皆右穀梁，穀梁之學始顯。傳穀梁者，有博士楚人申章，昌（申章複姓）琅琊人房鳳，及胡常，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以上諸儒，關於公羊穀梁之著述，亦多亡失。

西漢諸儒傳經的情形，略如上述。所傳之經，都是「今文」。但並無「今文」的名稱。這許多家數的今文經，西漢時皆先後立於學官。所謂立於學官者，就是特設博士，教授這一派的經學，和現代大學裏特設某

種學程教授某科某種學說，頗相髣髴。立於學官的經，以詩爲最早；文帝時，申培、韓嬰已以詩爲博士；景帝時，轅固亦以詩爲博士；齊、魯、韓三家詩，都已立於學官了。次之，是春秋；景帝時，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公羊春秋爲博士。武帝建元五年，五經博士乃普遍地設立。除三家詩外，書則歐陽、禮則后氏、易則京氏、春秋則公羊。其後，五經各以家法不同，分立博士。除詩已早分立三家外，易分施、孟、梁丘、京四家，書分歐陽、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禮分大戴、小戴二家，春秋分嚴、顏二家，是爲十四博士。一說，穀梁春秋，在宣帝時立博士，京氏易則立於元帝時。（見漢書儒林傳贊）十四博士中，不當列入京氏，遺去穀梁。

按西漢傳經之儒，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弟之所受，卽一字亦不敢出入。師法之嚴，既如此，則其分立博士之故，頗爲難解。詩之分齊、魯、韓三家，因此三人生非一地，學非一師，自有其不得不分之故。至於其餘各經，如易之施、孟、梁丘，同師田王孫，而其學皆出於楊何，則但須立楊氏；易書之二夏侯，同原於張生，張生又與歐陽生同師伏勝，則但須立伏氏書；至於京房，受易於焦氏，焦延壽自託於孟喜，而孟氏弟子不肯承認，更無立博士的理由；禮則二戴同出后氏，但須立后氏禮；公羊春秋則嚴、顏同師眭孟，且同爲公羊學，但須立公羊春秋。如同治一經之各家，恪承師法，學說相同，則不必分；如其學不同，則已背其師說，更不應立了。因爲西漢諸帝以立博士提創經學，諸儒均以立博士爲榮，所以增立了這一家，那一家，便以向隅而生怨望，以致紛紛

增設，如雨後春筍了。趙岐 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亦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於學官」的話。似乎西漢立博士者，不僅五經。但史記、漢書均無此項記載。史漢儒林傳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既僅具官，何至增設五經博士未備，何以旁及傳記諸子？劉歆、趙岐的話，怕都未必可靠！

武帝既立五經博士，又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復其身者，就是免其徭役。昭帝時，增至百人。宣帝末，又倍增之。元帝好儒，增至千人。郡國又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時，弟子員增至三千人。平帝時，元士之子亦得受業如弟子，不限員額，歲課之，分甲乙丙三科，以爲郎中、太子舍人、文學掌故。後世科舉生員之制，實本於此。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設弟子員，開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平帝年號）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史記儒林傳亦云：「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嚮風矣。」可見西漢提倡經學，全以利祿爲招。故方苞嘗曰：「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誘以利祿，儒之途通而其道亡！」誠爲知言！元帝尤好儒生，韋賢、匡衡、貢禹等，並以經學位至輔相。所以夏侯勝講授對諸生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見漢書本傳。）漢丞相太尉

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紫綬；取青紫如拾芥，言取高官是很容易的。而韋賢時亦有「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之語。（見漢書本傳。）可見現在還傳誦人口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的思想，在西漢末已深入人心了。

漢儒有所謂「天人之學」，頗近陰陽家言；蓋以天道牽合人事者。故尚書有「五行」之說。（洪範「九疇」即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尚書甘誓，夏后啓征有扈氏，宣布他的罪狀，第一件便是「威侮五行」。蓋五行說夏代已盛行。我國之醫學及道教，都採用之。）齊詩有「五際」之說。（詩有五際，見漢書翼奉傳。應劭以為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孟康注引齊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故皮錫瑞詩經通論謂此亦陰陽災異之類。）公羊春秋多言災異，（如董仲舒求雨求晴等說。）易有象數占驗，禮有明堂陰陽。（漢志禮類有明堂陰陽記。）按孔子春秋亦書星變日食，原恐人主自謂至尊，無所忌懼，故借天道以示儆，使知所恐懼修省。這原是「神道設教」的意思。西漢諸帝崇經術，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詔罪己，或責免三公，尚有君臣交儆的遺意。但後來則漸變為迷信之談，以為儒者言災異，實有徵驗。例如昌邑王賀在位時，夏侯勝以久陰不雨，有臣下謀上者，果

應在霍光的廢立，昭帝時，眭孟言有匹夫爲天子者，果應在宣帝的起自民間，成帝時，夏賀良以爲漢有再受命之祥，果應在光武的中興。於是經學遂與方士圖讖預言之說相合。（近人夏曾佑中國歷史有儒家與方士之糅合一章，可參看。）按史記趙世家云：『秦讖於是出。』圖讖之說，戰國時早已有之。秦始皇本紀所載「亡秦者胡」，「祖龍明年死」，項羽本紀所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等，都是讖語。不過到了漢末，更加盛行，且和經學混合而已。（如那時的經學大師劉歆因爲「劉秀作天子」的讖語，便改名曰秀。由今日觀之，實祇覺其可笑。）而哀平之間興起的「緯書」，實爲「經」與「讖」之間的東西。六經和孝經各有緯書。如易緯有乾坤鑿度、乾鑿度、稽覽圖、辨終備、通卦驗、乾元序制記，是類謀、坤靈圖八篇，今存殘本，皆由後人輯佚而成。餘如尚書緯有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帝驗期、五行傳、尚書中候等，詩緯有含神霧、汎歷樞、推度災等，禮緯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等，樂緯有動聲儀、稽曜嘉、叶圖徵等，春秋緯有文耀鉤、連斗樞、感精符、演孔圖、元命苞等，孝經緯有援神契、鉤命訣、中契、左契、右契等，均已亡佚。古微書及玉函山房輯佚書中雖尚有輯存的，也不過吉光片羽而已。緯書所說，頗多怪誕無稽之談。如說孔子作春秋，絳衣縹筆，告備於天，天降赤虹，化爲黃玉，有「卯金刀，名禾子，天下服」等話，真是荒誕可笑。卽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的「三綱說」，也出於禮緯含文嘉，經無明文；因爲馬融朱子注論語，都曾引之，大家習見了，

爲它是孔子的倫理說，實亦不足依據。

漢儒還有一種「通經致用」之說，如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之詩常諫書之類。詩本多諷諭，其美刺朝政之作，容或可於講說時乘機進諫。但如王氏於昌邑王被廢後所說，「臣以三百五篇諫，故無諫書」，終似諉責卸罪的飾辭。董仲舒的以春秋決獄，實事不可詳考；但孔子作春秋，旨在褒貶當世君臣，恐不能援用之以當漢代的法律。黃河形勢，時有變遷；夏禹去西漢已遠，豈能一成不變地采用治水之法？何況禹貢中並沒有詳述他治河的法子。至於以洪範察變，更是漢儒喜言五行災異的窠臼，不足以言經學了。

西漢諸儒，承秦始皇焚禁之後，傳授羣經，加以整理，致力於章句訓詁，使羣經得復昌盛，其有功於經學，誠不可沒，且重在「微言大義」，頗能兼「義理」「訓詁」之長。雖司馬談已有「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其事不可盡從」的批評，但比之後來「碎義逃難」的章句小儒，徒以繁博見長，使人丁年窮經，皓首不能終其業者，終覺稍勝一籌。而武帝以後，迄於元戎，爲經學全盛時代，亦是很昭著的事實。且所傳之經都是「今文」，雖說解各有派別，各守師法，而於本經則並無懷疑。後世所以稱「經學」爲「漢學」者，正因「經學」至西漢始能確立的緣故。我們要明白西漢傳經諸儒的派別，可參閱史記漢書的儒林傳。本章所述，不過其大概而已。

第十五章 經今古文的分合

據上章所述，西漢諸儒傳授之經，立於學官者，皆「今文」本。及西漢末，哀平之世，劉歆繼其父向領校羣書，乃在祕府中發現「古文」書寫的經。於是名以前立於學官者爲「今文」經。經有「今文」「古文」之別，第二章裏已說過了。現在再把五經古文的傳授，撮記於下：

(一) 毛詩——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毛公之後，由貫長卿解延年，徐敖而至陳俠，爲王莽時講學大夫。藝文志六藝略序詩類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據經典釋文序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自注云：「一云名萇。」）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按漢書僅云毛公，鄭玄詩譜始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於是毛公有二人了。陸璣詩草木蟲魚鳥獸疏始云：「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大

毛公、萇、小毛公。於是大小毛公的名字方爲人所知了。毛詩傳授之人，雖敘述得明明白白，但二說又各不同，且最重的毛公，初僅一人，後忽有二，其名亦最後方出現。

(二) 古文尙書

漢志云：『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

古文尙書……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

於學官。』

釋文敘錄云：『古文尙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之……皆科斗

文字。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爲

四十六卷。安國又受詔爲古文尙書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之私家。』又述其

傳授，謂安國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暉，王莽時皆立於學，致貴顯。按

魯恭王名餘，景帝子，以景帝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六年而卒，則其得書，當在武帝十年以前；而漢志云

武帝末且巫蠱事在武帝末（征和元年）。苟恭王於武帝初得書，而孔安國獻之，何至因巫蠱事而

不得立？且史記五宗世家中記恭王事，又何以不載此事呢？至於孔安國爲古文尙書作傳，則史漢儒

林傳均未提及。

(三) 逸禮與周禮

漢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

欲移讓太常博士書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篇。』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自注云：『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按卽冬官）乃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其禮古經五十六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曰逸禮……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而於所謂逸禮及周官經在西漢時之傳授，則未詳述。按賈公彥敍周禮興廢，引馬融傳云：『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序著於錄略。』則周禮之發現，始於劉歆，是很明白的事實了。周禮在王莽時立於學官，按史記不載二王得古文禮及周禮之事，二經之傳授，又不見於載籍，較毛詩古文尙書，更無從考證。

（四）古文易——有二種：一爲費直所傳，現存十三經中；一爲高相所傳，已亡。漢書儒林傳云：『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文言」二字似當在「十篇」二字上；否則只是文說之意，非指乾坤文言。琅牙王璜能傳之。『高相，沛人也，與費公同時；其學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爲王莽所誅。……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按費高二家之易，傳自何人，終無可考。

(五) 春秋左傳——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釋文敍錄述左傳傳授，則謂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遞傳吳起及其子期，以迄鐸椒、虞卿、荀卿，而至張蒼、賈誼及其孫嘉，嘉授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貫公子長卿傳張敞、張禹，禹傳尹更始及其子成與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又謂劉歆從尹成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云：「平帝時始得立於學官。」按左傳是否為春秋經之傳，抑為劉歆從國語中抽出以附春秋經者，至今尚為疑問；此在第十章中已詳述之。而張蒼、賈誼之傳左氏，史記本傳中亦未提及。

據漢志所記，魯恭王得於孔宅壁中的古文經，尚書、逸禮之外，尚有論語、孝經。釋文敍錄言古文論語、孝經，孔安國均曾為之作傳。至於春秋穀梁傳，向來大家認為是「今文」的，近人崔適的春秋復始也說它是「古文」。

第二章裏曾說到過：「六經次序，」「今文」家和「古文」家的排列不同；前者認孔子為教育家，六經為孔子作以教人者，故以程度淺深為序，而列成「詩、書、禮、樂、易、春秋」；後者認孔子為史學家，六經為周公舊典，為原有古代的史料，故以時代古今為序，而列成「易、書、詩、禮、樂、春秋」；我們試一檢閱漢書藝文志和儒林傳所列的六經次序，完全和古文家所排的相同。那末，今文家所排列的次序，見於什麼書呢？大概西

漢末世古文經未發現以前的諸書，說到六經，其次序都與今文家所排列的相同。列如：

荀子儒效篇云：「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按此條缺易。)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云：「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

史記儒林傳敘西漢傳經之儒，亦以詩、書、禮、易、春秋爲次序，與漢書異。餘如莊子天下篇及天運篇，禮記經解所說，已見本書第一章者，亦與今文派所列次序大體相同。

除六經次序之外，今古文兩派的經學，不同之點極多。擇要言之，則今文家崇奉孔子，尊孔子爲受命之「素王」，(猶今言「無冠帝王」)視孔子爲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之作六經，旨在「托古改制」，爲後世立法；古文家崇奉周公，奉孔子爲先師，視孔子爲史學家，以爲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見論語述而篇)。其於六經，不過就古代原有的官書史料加以整理而已。今文經，西漢皆立於學官，故傳授皆可考；古文經，西漢末方發現，西漢末世前皆未立於學官，故傳授多不可考。今文家以春秋公羊傳爲最主要的書，他們信緯書，以爲微言大義間有存者；古今家以周禮爲最主要的書，他們斥緯書爲誣妄，所重在章句訓詁。今文家斥古文經傳爲劉歆所僞造，全不可信；古文家斥今文經傳爲秦火之餘，殘缺不全。這兩派既

成對峙之局，於是從西漢末年至東漢中世，遂常起紛爭。這種爭論，在史書上有明白記載的，約有四次，現在先列簡表如左：

次數	時期	人		物		爭論經籍
		(今文派)	(古文派)			
第一次	西漢哀帝建平元壽間	太常博士 孔光 龔勝 師丹	劉歆	古文尙書 (皆古文)	逸禮 左氏春秋 毛詩	
第二次	東漢光武建武間	范升	韓歆 許淑 陳元 李封	費氏易 左氏春秋 (皆古文)		
第三次	東漢章帝建初初年	李育	賈逵	左氏春秋(古) 春秋公羊傳(今)		
第四次	東漢桓帝靈帝時	何休 羊弼	鄭玄	左氏春秋(古) 春秋公羊傳(今)		

總之，與古文經關係最密切的，是西漢末的劉歆。歆，西漢宗室，劉向子，字子駿；後又改名秀，字穎叔。哀帝初，繼其父領校祕書。嘗集所校之書錄爲七略，分書籍爲六類，爲我國目錄學之始。王莽篡位，以歆爲國師。後仍爲莽所殺。常歆領校羣書時，在中祕書中發現了許多古文經傳，及官侍中大中大夫，得親近，乃欲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乃數見丞相孔光，

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歆之意，以爲今文經傳是秦火燼餘，殘缺訛脫（如今文尙書僅二十九篇，古文尙書多十六篇，今文士禮僅十七篇，古文逸禮多三十九篇；以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的今文易，或脫去「无咎悔亡」，以古文尙書校歐陽大小夏侯的今文尙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且有口耳相傳，至後世始筆錄成書的，不如當時就寫錄成書的之信而有徵（如公羊傳是口授數世，至漢初，始由公羊壽、胡毋子都寫錄成書，不如左丘明親見聖人，當時寫成的左傳可靠。）而且古文經傳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的。這封信，見於漢書楚元王傳末所附劉歆傳中。當時博士們的意見如何，雖無從考見；但歆書中言「以尙書禮爲備，以左氏爲不傳春秋」，則博士們衛護今文，攻擊古文之力，已可想見。這封信發表後，諸儒皆怨恨，名儒光祿大夫龔勝甚至憤而上書辭職；大司空師丹也怒而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歆於是自求外放，出爲河內太守，而古文經傳終不得立於學官。直到他佐王莽篡漢之後，封爵嘉信公，任爲國師，故左將軍公孫祿還說他「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之以慰天下；可見當時古文派對於劉歆的厭惡了！——這是第一次爭執。

東漢光武建武時，尙書令韓歆上疏，請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集公卿大夫博士於雲臺。帝令博士范升評說。范升對曰：「左氏不祖於孔子，而出於左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

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至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驥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驥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謹奏左氏之失凡四十事。……」詔以下博士。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以爭之。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爲博士。諸儒論議諠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這是第二次的爭執。

從此以後，信仰古文學的人漸漸多起來了，操有政治權威的帝王也漸漸傾向古文派了。章帝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經。帝善其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公羊穀梁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逵又數爲帝言今古文尚書同異，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同時今文家李育習公羊春秋，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且多行圖讖，不合理義，於是作難左氏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這是第三次的爭執。

第四次的爭執就是桓靈之間的公羊大師何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之意，作公羊解詁，復作公

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以伸公羊，而絀二傳。鄭玄乃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難之。這較前三次，已是零碎而不熱烈了。——今古文的爭論，事實上或不僅這四次。但經過多次爭執以後，古文經學乃漸盛於東漢。我們尋繹後漢書，可發見許多古文經學家，如鄭衆、杜林、桓譚、賈逵、馬融等；而今文經學家，如李育、何休，終寥寥可數。可見東漢是經古文學的全盛時代。西漢宣帝嘗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而石渠議奏今已亡失，僅略見於唐杜佑通典中。東漢章帝亦嘗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論同異，命史臣集爲白虎通義，猶存四卷。參加此次集會的大儒，如杜育、楊終、魯恭、魏應，皆信今文學，故白虎通義中采古文說尙甚少。西漢今文之學，十四博士所傳，賴此一書，尙可窺見大略。

東漢經學異於西漢者，不僅今古文盛衰的一端。西漢經師多專一經，罕能兼通。禁焚之令初除，經籍初出時，甚且或爲雅，或爲頌，集數人之力以通一經。（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如申培之兼通詩與春秋，韓嬰之兼通詩易，孟卿之兼通禮與春秋，已是難得；如夏侯始昌的兼通五經，竟是絕無僅有了。東漢則尹敏、習歐陽尙書，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景鸞則兼通齊詩、施氏易及河洛圖緯，又撰禮內外說；餘如何休精研六經，許慎五經無雙，蔡元學通五經，至於鄭玄乃徧通羣經，此相異者一。西漢經師篤守遺經，略備章句，罕有撰述；漢志所載，惟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爲最多。東漢則周防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景鸞所作，易說、詩解、

禮略、月令章句凡五十餘萬言；馬融作三傳同異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至於鄭玄，乃徧注羣經。西漢經師，如申培詩訓，疑者弗傳；丁將軍易說，但舉大誼。東漢則一經之說，至百餘萬言。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說堯典篇目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日若稽古」四字，三萬言。』按後漢書，秦恭字延君，其學出小夏侯，增師說至百萬言。延君卽近君，其學出於夏侯建；大夏侯勝已譏其破碎了。因爲西漢經師文尙簡樸，其研究羣經注重大義，東漢經師文多泛濫，其研究羣經，注重訓詁。此相異者二。西漢經師弟子多至千餘人者，已爲極盛。東漢則張興弟子著錄者且萬人；牟長弟子，先後萬人；蔡元萬二千人；樓望九千餘人；宋登數千人；姜肱、曹曾各三千人。一師能教弟子千萬人者，必由高足弟子轉相傳授；故鄭玄在馬融門下，竟至三年不得見了。此相異者三。西漢經師篤守「師法」，其後師法之下，又各分家數；乃有所謂「家法」。如今文易有施、孟、梁丘三家，這是「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家有翟白之學，梁丘家有士孫、鄧、衡之學（均見前章）。那就是「家法」了。嚴格地說，則施、孟、梁丘三家都傳自田王孫，同出一師，以「師法」言，已不必分爲三家了。後漢書儒林傳云：『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宦者蔡倫傳云：『……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讎家法。』左雄傳云：『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可見東漢經學所重者在家法，此正范曄所云：「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了。此相異者四。

經今古文兩派的分爭，從西漢末到東漢末，既然如此熱烈，爲什麼後來又漸漸地消聲匿迹，并今古文的經傳也混合了呢？因爲東漢末出了一位混合今古的經學大師鄭玄。玄字康成，高密人，既通五經，又西入關師馬融，及黨錮禍作，被禁十四年，潛心經學，成書甚多。北海相孔融甚敬之，爲立一鄉曰鄭公鄉，門曰通德門。弟子甚衆，嘗輯其答問之語曰鄭志。當今古文對峙的時代，今文家斥古文家爲「顛倒五經，變亂師法」，古文家斥今文家爲「專己守殘，黨同妬真」，各守門戶，兩不相下。所以杜林、鄭衆、賈逵、馬融注左傳、周禮，不采今文說；何休注公羊傳，不采古文說；許慎作五經異義，也分別今文說，古文說。及鄭玄出，從師不拘家法，學通今古。據後漢書本傳說，他曾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今）公羊春秋（今）等；又從東鄭張恭祖受周官（古）禮記（今）左氏春秋（古）韓詩（今）古文尚書。後以山東無足問者，又西入關，師事扶風馬融。當時的古文大師，玄既學無常師，博通今古，見當時今古文兩派攻難不休，乃欲參合其學，自成一言之言。於是徧注羣經，據本傳所載，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等，都有注解；而其內容，則都兼采今古文之說。如箋詩，雖以毛傳爲主，而又時違毛義，兼采三家；注尚書，雖用古文，而又和馬融不同，或從今文說；注儀禮，從今文說，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於是鄭注行而齊魯韓三家詩、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都廢了。易與論語等，也是如此。那時的學者，正苦家法的繁雜，又見他閱大淵博，無所不包，於是翕然

歸之。故今古文的派別，至鄭玄而始混合。

鄭玄已是東漢末人；那時反對鄭玄的，又出一王肅。肅字子雍，已是三國初魏的東海人了。官至中領軍散騎常侍。嘗注尚書、詩、三禮、左傳、論語，并撰定其父朗的易傳。王肅的反對鄭玄，並不攻擊他混合今古文的一點，因為他自己也是混合今古文的。王肅的父親王朗，師事楊賜，楊氏世世傳今文歐陽尚書。肅受其父學，當然是通今文學的了。但又好賈逵、馬融的古文學。他的反對鄭玄，無非想藉此在學術界中一露頭角，所以或用今文說駁鄭玄的古文說，或用古文說駁鄭玄的今文說。其混合今古文仍和鄭玄是半斤八兩。而且偽造孔安國的尚書傳（即今偽古文尚書之孔安國傳）、論語注、孝經注。又偽造孔子家語及孔叢子，以為其聖證論的根據。當時鄭學之徒，已說孔子家語為王肅所增加，王肅所偽造了；到了清朝，經過許多學者考證，孔子家語與孔叢子，已確知為王肅所偽託，偽古文尚書的偽孔安國傳之出於王肅，亦已證明。且孔安國早卒，史記漢書皆不云有所著述，論語孝經二書之注，亦不見於漢志。王肅偽造孔氏子孫的著述，作他自己攻擊鄭玄的專著聖證論的根據，不但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其手段，真可說卑劣極了！王肅的女兒嫁給司馬昭。西晉開國的武帝司馬炎是他的外孫。於是他的尚書、詩、三禮、論語、左氏解和他父親王朗的易傳，得藉帝王的勢力，立於學官，使鄭學受一大打擊。然而今古文的師法分別，更無人過問。當時儒者所知道的經學

上的爭論，也只同是混合今古的鄭玄、王肅二派了！

總之，經籍經秦焚禁而復出於西漢之初，西漢經師口授筆錄，章句訓詁，整理羣經，篤守家法，而經學始成立。武帝置五經博士之後，繼以元成二帝之好儒，於是十四博士立於學官，經學乃入於全盛時代。西漢之末，出一劉歆，憑藉王莽的政治勢力，提倡所謂「古文經」，遂啓今古文的分爭。東漢以後，相仍未息，但古文經終漸漸盛行於東漢。今古文之分，至鄭玄而始混合，而三國時，復出一王肅，以反對鄭玄之故，不惜偽造古書，以爲根據，又藉他外孫司馬炎的政治勢力以壓倒鄭玄。如其今文家古文經出於劉歆偽造的話是可信的，則兩漢末年各出一偽造古書的學者，以紊亂經學，倒是前後遙相對映的！

第十六章 經學的衰落一

經學盛於西漢，至西漢末古文經出，而經學始分化；經古文學盛於東漢，至東漢末今古文混合，而經學始衰落。東漢末世，桓靈之間，黨錮禍起，學者多被株連，繼以黃巾之擾，三國之爭，五胡之亂，兵禍連綿，社會羹沸，經學遂益衰落。這又是學術本身以外政治環境的影響。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序云：「正始中，有詔議圓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詔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飽食相從而退。」可見那時經學的衰落情形了。

鄭玄王肅雖分立門戶，各不相下，而其混合今古文則同。西晉雖崇王學，而王鄭仍成分爭之局。申王駁鄭的，如孔晁、孫毓等；主鄭駁王的，如孫炎、馬昭等。所以魏晉以後經學的分爭，只有鄭王兩派之爭，不復有今古文之爭了。加以那時今文經逐漸亡失，如齊詩、魏時已亡、永嘉之亂、梁丘、施氏、高氏易、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均亡；魯詩亦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孟京、費易，亦無傳人。公羊雖存若亡。東晉元帝置諸博士，周易用王弼注，尚書用鄭玄注，僞古文尚書用僞孔安國注，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孝經，皆用鄭玄注，春秋左傳用服虔、杜預注。無一爲西漢十四博士所傳者，而今文之師法遂絕。

現在十三經注疏裏面的注，毛詩、周禮、儀禮、禮記（鄭玄注）、公羊傳（何休注）、孟子（趙岐注）皆漢人遺著；孝經則唐代作。（唐玄宗注。）魏人所注的凡三部：尚書偽孔傳，據清人丁晏尚書餘論，爲王肅偽造；周易，王弼注論語，何晏集解。晉人所作的凡三部：左傳，杜預集解；穀梁傳，范甯集解；爾雅，郭璞注。王弼、何晏都喜談玄理，與漢人樸實說經的學風大異。故宋趙師秀說：『輔嗣易行無漢學。』何晏集解引孔安國論語注，據丁晏說，孔注亦是王肅僞作。杜預左傳集解多據前人說解而沒其名。清焦循也斥杜預背父黨篡之罪。（預父恕仕魏，而預仕於晉。）其注多替司馬氏粉飾，爲名教罪人。（例如釋例於「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一條，大加申述；於鄭伯射王中肩一事，則曲爲鄭莊公解脫之類。）范甯穀梁集解序於三傳皆加詆譏；與漢儒三傳各守專門之學風大異其趨，至於郭璞爾雅注，清余蕭客也說他沒前人說解之名爲「攘善無恥」，這樣說起來，魏晉人的注經，不及漢人多了。

五胡亂華，東晉偏安之後，政治上便成了南北對峙之局；經學也分爲「南學」與「北學」二派。北史儒林傳序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又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人深蕪，窮其枝葉。』按鄭玄注左傳未成，以授服虔，見世說新語，是服學本出於鄭，而北學易、書、詩、禮、左傳，皆宗鄭氏了。故時人爲之語曰：「甯疑孔

孟誤，不言鄭服非。一當時風尚，即此已可想見。南學，則宗鄭玄者僅禮一經，故江南晉宋間諸儒惟說禮以謹嚴詳實稱；杜佑通典中，尙可考見大略。最著者爲雷次宗，時有「雷鄭」之稱。其餘，以義理論，則多老莊玄言；以文筆論，則多駢儷腴詞。皇侃的論語義疏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此書得自日本，清人江藩疑係足利賸本；但按其文章，確是六朝人的手筆。）因爲江左之士，清談玄理，已成一時風尚；而齊梁以後，文學亦日趨駢儷；其影響自足及於經學。北方人的地方性本較南人樸實，又未染清言及駢文之風，故其經學亦與南方不同。

南朝帝王提倡經學的，當首推梁武帝。天監四年，詔立國學，開五館，設五經博士各一入以主之；又詔立州郡學，選遣學生就學於會稽雲門山之廬江何允；令太子及宗室王侯就學。但晚年信佛，又遭侯景之亂，故南學仍未大昌。北朝，則魏孝文帝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太學生員漸增至三千人；後又設國子學，立教授博士。北周亦徵沈重於南荆，待熊安生以殊禮。提倡經學，較梁武尤力。清焦循曾說：「正始以後，人尙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於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爲儒林立傳。梁天監中，漸尙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魏儒學最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最盛。」南北朝經學盛衰，看了這一段話，已可知其大概。那時候，南北經學，風尚不同。北學宗鄭玄，南學宗王肅；以經學的造就論，王

不如鄭。北俗質樸，南俗文華，以說經的體例論，華不如質。而且南朝諸儒無足以領袖羣倫者。北朝經師當首推魏末的徐遵明。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史稱其幼孤好學，歷更數師，均未卒業，指其心曰：「吾今知其師所在矣。」遂苦讀深思，不出院門六年，卒通羣經。後爲亂兵所害。遵明兼通易、書、三禮、春秋；得其傳者甚衆，如郭茂之於易，熊安生之於禮，其尤著者。故求經學鉅儒於北朝，當首推徐遵明。（按公羊傳何氏解詁疏，唐志不載，宋崇文總目始著錄，云：「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清王鳴盛以爲徐彥卽徐遵明，以此書文筆論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洪頤煊引疏「三府掾」一條，有云：「若今三府掾，」謂三府掾，六朝時有之，唐以後無此稱。云。姚範亦云：「隋唐間不聞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間乎？」則王鳴盛的話，似不爲無見。）以後劉焯、劉炫，雖亦負一時盛名，但擇術終不如徐氏之正。

隋文帝統一南北，經學也隨之而統一。但政治上的統一，是南併於北；經學上的統一，却是北入於南。本來南北朝時，青齊一帶，多講王弼注的易，杜預注的左傳，魏晉經師之書，已漸漸自南方傳於北方。後來費甝的尚書僞孔傳義疏也傳至北方，爲劉士元、劉光伯所崇信。而那時一般搢紳先生，以爲他們「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奉爲宗師。南方爲北方所征服，何以經學反能使北方人折服呢？因爲那時北方爲異族所統治已久，南朝的衣服禮樂，文采風流，素爲北方人所豔羨。（例如王褒入關，貴游都學他的書法，庾信歸周，羣公碑

志多出其手，信有惟韓陵一片石可與共語，餘皆驢鳴犬吠之言；高歡也嘗說：「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而且北人篤守漢學，以樸實說經，如非專家，便覺無可悅目；南人善談名理，飾以華詞，表裏可觀，雅俗共賞。因此，雖亡國之餘，亦足以轉移一時風尚，使北人「盡棄其學而學焉」了。按隋書經籍志所記，於易則云：「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學官，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於書，則云：「梁陳所講有鄭孔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於春秋，則云：「左氏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可見政局統一，經學亦統一；經學統一之後，南學盛行，北學則從此絕了。

隋文帝初年，頗重儒學；史稱那時「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尋師，不遠千里，誦讀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但其暮年又不悅儒術，天下之學，僅存國子一所，弟子才七十二人。煬帝卽位，雖也曾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但終因外競武功，內肆荒淫，致經籍復爲煨燼，儒生轉於溝壑。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學術僅賴帝王一時高興的提倡，終究是靠不住的！

南北朝諸儒本有義疏之學。北方如劉獻之的三禮大義，徐遵明的春秋義章，沈重（本南人，後歸北）

的周禮儀禮禮記毛詩喪服經義熊安生的周禮禮記義疏及孝經義等；南方如崔靈恩的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沈文阿的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疏皇侃的論語義疏禮記義疏王元規的春秋孝經義記等；都見於南北朝的義疏之學，確是漢人注經，唐人疏注，二者之間的橋梁；其承先啓後之功，決不可沒。及唐太宗時，乃有詔定五經正義之舉，追溯淵源，不能不說六朝諸儒的義疏，早已開它的先河了。

唐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穎達，字仲達，衡水人。隋末舉明經；煬帝時與諸儒論議東都，年最少而爲之冠。入唐，官至國子祭酒。穎達卒後，博士馬嘉運駁其所定正義之失，有詔更定。永徽二年，又詔諸臣考證增損。四年，乃詔頒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其後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當時與穎達同修正義者，周易則馬嘉運、趙乾叶，尙書則王德詔、李子雲，毛詩則王德詔、齊威，春秋則谷那律、楊士勛，禮記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頤、張權。以穎達年輩最先，名位最高，所以由他總攬其成，並標他一個人的姓名。實際上則穎達在太宗時，年已耄耋，未必能逐條親加核閱了。

官修之書，雜出衆手，未能自成一家，往往不滿人意。例如二十四史中，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史特

別爲人所重視；便正因爲它們是私人的著述。晉書是唐代官修之史，就大爲劉知幾史通所呵詆了。史書如此，經疏亦豈能獨居例外？而且據隋書經籍志所云：鄭注易、書、服注左傳，在隋已浸微，到唐初，已都成絕學；故易采王弼之注，書用僞孔之傳，左氏主杜預之集解。雖諸儒因一時好尚，棄彼取此，論者責其不分朱紫，不辨真僞；但也是勢所必至，事有固然的。當時分經撰定正義，又必各有底本，故多沿襲前人。（如尚書彛典疏中有「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廢之」的話，呂刑疏中有「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的話。唐人著述而稱「大隋」，明明是鈔襲前朝人的話了。）其尤可笑者，則鈔襲而又加以割裂顛倒，致首尾不能銜接，似有譌脫。（例如左傳疏襲劉炫規杜之文，劉本先申杜注，而後加以規正。左傳正義乃剪截而倒置之，先列劉說，而後以劉氏申杜之文駁之。詳見清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而且對於讖緯之說，毛詩正義、禮記正義則以爲是，尚書正義則以爲非，同屬五經正義，而自相矛盾。所以五經正義並不能算一部有價值的著作。朱子說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批評頗爲得當。

在五經正義之前，唐初還有總攬羣經的兩部大書。一部是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德明，本名元朗，以字行，吳縣人。唐高祖時，官國子博士。其著此書，創始於陳後主元年，成書在未入隋之前。故書中引北音，僅一兩見。序錄於王曉的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而北方大

儒如徐遵明者始終未嘗提及陸本南人，南人不通北學，是當然的。所以他的釋文，易主王弼，書主偽孔，左傳主杜預，恰開唐人五經正義的先聲。還有一部是顏師古的五經定本，五經正義常引之。師古字籀，萬年人。官至祕書監，中書侍郎。其考定五經，亦是受詔爲之。師古是顏之推的後人。之推以南人歸北，故顏氏家訓中凡提到江南河北，多以江南爲是。師古定本多從南學，疑卽本於家訓。例如詩大田「興雲祁祁」，詩正義卽引定本作「興雨」，以或作「興雲」爲誤，正與顏氏家訓相同。（按古本作「興雲」，漢無極山碑可證。且作「雨」，則與下句「雨我公田」之雨字重複。家訓以班固靈台詩「祁祁甘雨」爲據。其實，班氏乃合「興雲祁雨我公田」二句爲一句。班氏所作漢書食貨志引詩，正作「興雲祁祁」。）

唐朝私人著述的經解，如史徵的周易口訣，成伯璵的毛詩指說，韓亨的論語筆解，都是寥寥短篇，無關宏旨。陸澹的春秋纂例，微旨辨疑，頗有能發前人所未發的議論，如謂「左氏爲六國時人，非論語之丘明，雜采諸書，多不可信；公穀口授，子夏所傳，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云云。但是春秋三傳本各自成一家言，從未有合三傳以成一書者；如以兩漢專門師法衡之，未免失了經學的軌範。陸澹之說，本之啖助，趙匡，已開宋人講春秋的風氣了。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多存古義；荀爽，虞翻等漢人易學的遺說，賴此尙存大略。——總之，唐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對於文學的貢獻，韓柳古文而外，有駢文，有詩，有傳奇小說，詞

亦起於中晚唐；至於經學，則除了官修的五經正義以外，却說不上什麼成績。

唐人有本不以經學名家，而其論經之言有足取者。如宣宗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有立春秋左傳學議，略謂「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左丘明爲魯史，載述時政，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故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參貫二義，乖刺不侔」云云。此議見於說郛中令狐澄的大中遺事，孫光憲的北夢瑣言亦載之。他說春秋是經，左傳是史，左氏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也就是西漢博士所云「左氏不傳春秋」。東漢博士范升所說「左氏不祖孔子」的意思。自東漢以後，公羊微，左傳盛，杜解出，人皆以左傳爲聖經，執杜解爲傳義，甚至於經傳不合處，不云傳誤，反云經誤；如劉知幾史通更以史的眼光評論經傳，惑經，申左，詆毀尤多。皆由不知春秋是經，左傳是史，經重一字褒貶，史則據事直書，體例本不相同。而陳商獨能有這種卓識，在唐代已是不可多得的了。

唐人說經之書傳於今者甚少。按唐書藝文志，經部所著錄的唐人的五經義說，也有數十種，現存的不到十分之一。因爲那時還沒有刻本，僅賴傳鈔，所以一遇兵燹，便易蕩爲灰燼。加以宋末以至元明，科舉取士，專用宋儒之書，注疏且束之高閣，何況注疏以外的經說？即使不亡於兵火，也易因無人過問而散失。總之，唐

人之書，如文集說部，傳至今世者，也並不多，不但經說而已；唐以前的書，傳至今世者，也並不多，不但唐代的著述而已。刻板印書，始於唐末五代。後唐長興三年，始刻九經印板，經書之有木板印本，實始於此。印刷術流行之後，書籍便漸多了，便更易流傳了。宋以後的書，所以傳於今世者特多，便是因此。

說到刻板，便不得不追溯上去，談一談「石經」的源流。東漢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立於太學門外，蔡邕自書丹。此爲刻石經之始。可惜石碑已失，搨本亦散佚，僅於宋洪氏的隸釋中，存一千九百餘字。宋蓬萊閣刻石又壞。今江西的南昌，浙江的紹興，兩府學重刻的，只有六百七十五字。但與今世所傳的古文經，字多不同。考其所刻，有魯詩、小夏侯尚書、儀禮、公羊春秋、魯論語，而公羊春秋則有傳無經，漢時立學官本便是如此。魏主曹芳正始中，乃又有三體石經之刻。曰「三體」者，因爲是用古文、篆、隸三體字寫的，爲邯鄲淳所書。洪氏錄入隸續中。（按後漢書儒林傳說東漢熹平所刻就是三體石經，經典釋文及資治通鑑也如此說，誤。見宋趙明誠金石錄及近人章炳麟三體石經考。）此後，唐文宗開成二年，又刻九經於石，稱爲開成石經。雖史譏其「名儒不窺」，但也足以證今本之譌脫。（例如顧炎武以開平石經考監本儀禮，士昏禮中脫「壻授綏……」十四字。）後來又經乾符（僖宗年號）修造，後梁補刊三經，北宋添注四經，故其中亦多誤字。五代時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書易、詩、三禮、春秋三傳、論語、孟子十一經刻石。（孟子入

經部，始此。至南宋時，朱子定四書，乃正式成爲經書。是爲蜀石經。（自此以後，北宋太宗詔翻刻蜀十一經，是爲北宋石經；南宋高宗御書五經刻於臨安府學，是爲南宋石經；清高宗乾隆間，詔刻十三經於太學，宋嘉慶間又加以磨改，是爲清石經。）刻板印刷，是由刻石經的方法進化來的。

唐代科舉試士，有「帖經」之法。就其所習之經的注疏，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考他們的記憶。後來應考的人們，把難於記憶的經，總括起來，編成歌訣，以助記憶，名曰「帖括」。這種考試法，只能考試記憶，不能考試能否通經。但當時考試所重視的，本在詩賦及時務對策，並不重視帖經。對策能援用經義的，僅一劉蕡，引春秋正始之義，發宦侍無君之隱，而竟至下第，則科舉制度能真正選拔人才與否，已不言可知。若欲以帖經之法，提倡經學，真無異於緣木求魚了！

總之，從東漢末到五代，是經學衰落時代。自鄭玄王肅混合今古文，而兩漢經學之師法淆；自漢末、三國、西晉五胡之亂，西漢今文之書先後失亡，而今文之師法絕；自南北分立，經學亦北鄭，南王，分爲兩派，隋既統一，南學盛行，而鄭玄之學亦微。唐代經學，惟重疏注，五經正義集義疏之大成，惟以官修之書，紕謬頗多。私人說經，間有卓識，而著述之流傳不多；國家取士，法取帖經，與經術之宏旨無涉。而五代紛亂之世，乃繼石經而有木刻印刷之發明，此與我國文化之進展關係頗大，不但經學一端而已。就經學本身說，這一個時代，除南

北學宗鄭宗王，分岐消長，及由義疏之學以成疏注的正義而外，殆無足稱。其差強人意者，尙能守古義，承師傳，不好新奇，不憑胸臆而已。此種學風，至北宋初還存在。王旦作試官，以論語「當仁不讓於師」句爲題，賈邊解「師」字爲「衆」，被旦所斥。所以王應麟《困學紀聞》說：「自漢儒至於慶曆（宋仁宗年號）間，談經者守訓詁而不鑿。」可見北宋初年，學風未變。至北宋中世，乃起一極大變化。故經學當自東漢末至北宋初劃爲一時代。

第十七章 經學的衰落二

我國自西漢以後，儒術定於一尊，孔子之經遂爲學者所共尊的寶典。但兩漢的經學，重在研究書本的章句訓詁，宋明的理學，重在體驗個人的心性理氣，雖皆以孔經爲根據，而其根本的態度有「客觀」「主觀」之異。經學重客觀、理學重主觀，誠然不錯；但宋代慶曆以後之談經學者，亦復重在主觀，於是漢唐以來的經學爲之一變。司馬光論風俗劄子有云：「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識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陸游亦謂唐及國初（指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慶曆諸儒，乃排繫辭（指歐陽修）、毀周禮（指歐陽修、蘇軾、蘇轍）、疑孟子（指李觀、司馬光）、譏書之胤征、顧命（指蘇軾）、黜詩序（指晁說之）。蓋自劉敞的七經小傳，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出，而憑主觀以說經之風乃大盛。程頤易傳，專明義理；蘇軾書傳，橫生議論；都是這一派的作風。其長，在疑前人所不敢疑，有懷疑的精神；其短，亦在言前人所不敢言，有臆造的流弊。

易傳自田何施、孟、梁丘爲正傳，焦、京爲別傳。其後虞翻注易，引參同契，且言夢道士使吞三爻，已雜道士

的術數；王弼注易，喜談玄理，則又近老莊。宋初，道士陳搏作先天後天圖，託之伏羲文王，三傳而至邵雍，所以邵雍特精於術數。程子易傳專明一「理」字，但不信邵雍之數，不雜老莊之言，頗爲純正。朱子易本義，乃取河洛九圖冠於卷首；於是宋、元、明言易者，開卷便說先天後天，而易學爲之一變。

尙書傳自伏勝，歐陽生爲其正傳，大小夏侯已微異，古文說出乃大不同。五經異議所引古文尙書說，五經疏所引馬鄭古文說，類多援周禮以解唐虞之書。即使周禮爲周公所手定，豈能強堯舜下從成周之制？則古文說已不可信了。僞孔傳出於王肅，更不足信。至宋，乃以個人的揣度，懸斷數千年以前的事實。如說文王不稱王，戡黎者是武王，「王命周公後」是留後治洛之類。詩書都說文王受命，伏傳史記皆說文王稱王，王戡黎，史記又言周公老死於豐，且「留後」始於唐置節度留後，古無此官。而蔡沈書傳竟以己志改變事實。至吳棫、朱子之疑僞古文尙書，則又發前人所未發。朱子曾說：「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序是魏晉間人作。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偏記其難者，而易者全不能記？」僞孔傳古文尙書，晉以後無疑之者；吳棫、朱子始對它發生懷疑。所以宋儒對於尙書，功罪也各不相掩。

詩有齊魯韓三家，毛傳後出獨存，東漢以後皆宗之。歐陽修詩本義始辨毛鄭之失；蘇轍詩傳始謂毛序不可盡信；鄭樵詩傳辨妄，始專攻毛傳、鄭箋及小序；朱子乃將大小序別爲一論而辨之，名詩序辨說，其集傳

亦不主毛鄭；這都是很可貴的懷疑精神，而王柏作詩疑，乃用朱子之說以刪詩。辨大小序，是對的。其目鄭風、衛風爲淫奔之詩，且爲淫人自言之作，而據此以刪三百五篇，則其武斷或更甚於詩序了。東漢以後，說詩者都主毛鄭；至此，又爲之一變。

春秋之公羊穀梁二傳，東漢以後，已成絕學；傳習最盛者，爲「傳事不傳義」的左傳。王安石譏春秋爲「斷爛朝報」而廢之。其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可疑，蓋三傳不足信也。」三傳既皆不足信，則春秋真同「斷爛朝報」了。左傳家言「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而春秋所書，又復簡略；如三傳都不可信，則義例不明，事實不詳，非「斷爛朝報」而何？宋人治春秋者，多沿唐啖助、趙匡、陸淳一派，不復專治一傳。其中以胡安國之春秋傳爲最著。元明至定爲取士之本。胡氏春秋大義本孟子，一字褒貶本公穀，平心而論，原也未可厚非。但他鍛鍊太刻，揣摩太甚。如以「尊王攘夷」爲春秋大義，固未可非；而攘夷之義終爲尊王所掩，故襲宋太祖懲黃袍加身，釋功臣兵權的故事，而過張其辭，致啓高宗猜疑諸將之意。王夫之宋論謂岳飛之死，由於胡氏以春秋傳奏御經筵，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也不能說是苛論。宋儒治春秋不信三傳，自抒己見，而其流弊至影響於當時抗戰之局，誠可痛心！這和從前的治春秋也大不相同了。

三禮之學，宋時講習亦盛。王安石以周禮取士，而其周禮新義乃無甚可觀。衛湜的禮記集說，凡一百六

十卷，采摭之宏，可比李鼎祚的周易集解。陳祥道的禮書一百五十卷，貫通經傳，亦可稱爲闕傳。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僅成家鄉邦國王朝禮，喪祭二禮未成而卒，由黃榦續成。此書以儀禮爲主，取大小戴禮記及他書傳中之關於禮者附之。爲清代秦蕙田五禮通考、江永禮書綱目所從出。古禮，誠多不能復行於後世的。但能否行於後世是一事，古代有無此種禮制又是一事。強今世以行古禮，則迂；因今世已不可行，而臆斷古代之必無此制，則妄。宋人治禮，不信去古猶近的漢儒之說，而喜以己之意見，今之制度，臆改古禮，則悖於治經說禮的正規。

宋人治經，還有一種不好的，不合於治學態度的習氣，就是任意刪改經傳。鄭玄箋毛詩，亦間改經文，但多本之魯韓之說。其注禮於儀禮之喪服傳，禮記之樂記，雖明知爲簡策之錯亂，亦但存其說於注中，而不改經文。至宋，則風氣大變。朱子既取禮記之大學，定爲四書之一；又以己意分爲經一章，以爲是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傳十章，以爲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且移易先後，爲之補「物格而後知至」的傳又一章。其於孝經，也分之爲經傳，且刪去經文。按移大學，已先有二程子；刪孝經，則謂本之胡侍郎與汪端明；可見此爲宋人以主觀治經的習氣了。王柏作書疑，增刪尚書；作詩疑，刪鄭風、衛風，雅頌亦任意改易。俞廷椿復古論，割裂周禮五官以補冬官。吳澄禮記纂言將四十九篇小戴禮記顛倒割裂。這些都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徒然使經傳

失其真相而已。總而言之，是主觀太強的緣故。

前一章剛說過，唐代試士，有帖經之法，僅重記憶，不能必其通經與否。宋仁宗始恢復「明經科」。神宗用王安石變新法，乃改帖經爲「墨義」。唐代考試明經科，本有「墨義」「口義」二法。墨義是筆試，口義是口試。宋朝的墨義，則由王安石定三經新義，頒行天下，科場墨義必須遵用其義。三經新義，一是周禮義，安石自撰；二是詩義，三是書義，安石命呂惠卿、王雱等爲之。當時蘇軾已有「黃茅白葦」之譏；徐禧也說：「竊襲人語不求心通者相半。」因爲這三種以功令規定頒行的經義，已都是架空的議論了。陳師道後山叢談說安石三經新義既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不復求解經義。安石歎道：「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意變秀才爲學究！」可見立法的人到後來也在自悔了。南宋時，攻擊他的人也很多。趙鼎說：「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說：「安石使學者習其所爲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朱子也說：「經義甚害事，分明是侮聖人之言。」但南宋雖廢去安石的三經新義，而仍沿用其墨義之制。科場的經義，既都是架空的文章，於是經說也多空衍義理，橫肆議論之作。朱子答人問胡安國的春秋傳說：「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其中却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胡安國的春秋傳，不是後世頒之學官，用以取士的嗎？尙且不免與時文答策相像，其他也可想而知了！十三經疏中，有四部是宋人作的。論語、孝經、爾雅三部是邢昺作的疏；孟子

是孫奭作的疏。但是孟子疏並非真出孫奭。

兩漢的經學，至鄭玄而集大成；兩宋的經學，至朱子而集大成。熹字元晦，一字元晦，婺源人，僑寓建州。官終寶文閣待制。朱子爲理學大師，而其治學則偏於「道問學」，嘗徧注羣經。南北朝時，鄭學統一北方，但南朝則僞孔王杜之學仍盛，不盡宗鄭服。金元以異族入據北方，南宋偏安，又成南北對抗之局。初時南方行程學，北方行蘇學。北人雖知有朱夫子，未能全見其書。及元兵南下，得趙復，朱子之書始傳於北方。姚樞、許衡、劉因等都崇奉之。元仁宗延祐間定科舉之制，易用朱子的易本義，詩用朱子的詩集傳，書用蔡沈的書集傳，春秋用胡安國的春秋傳，禮記則仍用鄭玄注。蔡沈是朱子的弟子。所以元代科舉功令所定，五經之中，倒有三經出於朱子。從前隋朝南下併陳，統一中國，經學反而爲南學所統一；這時元朝南下併宋，統一中國，經學也是爲南宋的胡朱所統一；似乎兵力則北強南弱，學力則南盛北衰，成了我國歷史上的慣例。

就上所述過去的經學歷史看，東漢不及西漢，魏晉南北朝不及東漢，唐又不及南北朝，宋又不及唐；兩宋以後，元更不及宋，明更不及元，正所謂「每下愈况」了。元人僅讀宋儒之書，於注疏亦所得甚淺。如熊朋來的五經說，於古義古音，多所牴牾。元人說經之書本不多，傳者更少；即所存者，亦不足觀。蓋元以異族入據中國，年代又不長久；其武功雖偉大，而文治終不足道。經學的衰落，自是當然。明代以漢族復興，享國也頗長。

久而各種學術，除王守仁派之理學外，俱無足稱。治經者株守元人之書，不但注疏素未留意，即宋儒之書，亦少研究。如楊慎則作僞欺人，郝敬則憑臆妄說；最可笑者，豐坊僞造申培詩說，子貢詩傳，而竟無人能辨其僞。其庸中佼佼者，惟元趙沅的春秋屬詞，爲清代公羊家孔廣森之學的淵源；明梅鷟的尚書考異，辨僞古文尚書，爲清代閻若璩的先聲。在元明經學極衰的時代，真可說是鳳毛麟角了！

明成祖永樂十二年，敕胡廣等修五經大全，頒行天下。唐太宗詔孔穎達定五經正義，爲第一部官修經義的鉅著；越八百餘年，乃又有此大舉。帝王提倡經學，可謂竭力。可是五經大全的價值，乃更出五經正義之下。據顧炎武說，春秋大全全襲元人汪克寬的春秋胡傳纂疏，詩經大全全襲元人劉瑾的詩傳通釋。據紀昀四庫書目提要，周易大全割裂董楷、董真卿、胡一桂、胡炳文四人的著作而成；書傳大全也勦襲陳櫟的尚書集傳纂疏、陳師凱的書蔡傳旁通，禮記大全所采諸家之說凡四十二種，而以陳澧的禮記集說爲主。則所謂五經大全者，都是鈔襲而成，以上欺帝王，下誑學子。且元以宋儒之書取士，禮記一書還用鄭注；明人修五經大全，乃代以陳澧的集說代之；陳書空而陋，朱彝尊尊譏爲兔園冊子的，乃以之爲官書的藍本。其不能及唐代的五經正義，實爲理之當然。

顧炎武曾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五經大全之陋，上節已言之，八股，則其害尤烈。唐

之帖經，宋之墨義，已是陋劣的制度。至明以八股文取士，則誠如顧氏所云，「其害甚於焚書」了。「八股」亦稱「八比」。這種文章，有規定的格式：一曰「破題」，以二句道破全題的要義；二曰「承題」，申明破題的意思；三曰「起講」，亦名「原起」，爲全篇開講之處；四曰「提股」，亦稱「提比」，起講後引入正文；五曰「虛股」，亦稱「虛比」，承提股之後，以後亦有不用者；六曰「中股」，亦稱「中比」，爲全篇之中堅；七曰「後股」，亦稱「後比」，暢發中股未盡之意；八曰「大結」，爲一篇之總結，以後亦多不用。我們試想，做文章規定呆板的格式，還會有生氣嗎？八股不但格式有規定，題目也以四書爲範圍，體裁也限定須代聖賢立言。例如題目是孔子的話，便須學孔子的口氣；是孟子的話，便須學孟子的口氣；所以孔孟以後的史實，是不許引用的。因此，八股文出身的人，竟有不知秦以後的歷史的。又因爲題目限於四書，於是到了清末石印術輸入以後，便有用它來印小冊子，以便試場攜帶的，如小題文府、大題文府之類，把四書中各章各句都當做題目，做成八股文，以便考生鈔襲。而且從明到清，四書裏的題目差不多都出過了。試官爲避免發生流弊起見，於是有毫無道理的題目，有所謂「截題」（截某句的一部分爲題，如論語首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僅截取「學而」二字爲題之類）、「搭題」，「截搭題」（取上下二句絕不相干者搭合爲題，甚且各截半句，搭合起來，如取論語季氏篇末句的下半，與下陽貨篇首句的上半爲題，曰「君夫人陽貨欲」

之類。等。這類題目，也得挖空心思地做成八股文，豈但難能而不可貴，簡直是玩把戲而已。讀書人因為想得功名，做官，把一生的聰明才力都耗費在這種把戲裏；個人的天才被埋沒了，國家的人才也被斷送了！這種八股文，是怎樣來的呢？是起於宋的墨義。上文不已說過，南宋時廢了三經新義，而仍沿用墨義。墨義也以經句爲題，便漸漸地變成了四書文。梁傑四書文源流考云：『南宋楊誠齋汪六安諸人爲之椎輪，文文山居然具體，』及元仁宗定科舉考試法，王充耘作書義於式一書，而八股文之形式始略具。明初又更定體式，憲宗成化中，更以功令規定字數，而八股文乃成爲科場嚴格的文格。所以八股取士名爲「明經」，實爲荒經。南宋至明，經學的日益衰落，此其主因之一。

漢人注經，唐人疏注，經學已是陳陳相因，不能闢出一條新路，易令學者厭倦了；而佛學自六朝隋唐以後，漸盛於中國，其尤易使學人受影響的，則爲達摩所創之禪宗。禪宗明心見性，不落言詮等說法，更易打動感到偏重客觀、專重文字的注疏之學的煩瑣空疏之苦的學人們的心。而東漢末張道陵所創的道教，又與道家老莊玄言相淆雜。以成其所謂太極先天諸說。於是到了北宋，儒家孔孟之道，遂受佛道二家之影響，孕育而成以心性爲研究對象的理學。試看宋儒理學開祖的周敦頤之太極圖說，及邵雍之以易理術數著名，便可了然。繼周敦頤之後，而與張載同時者，有程顥程頤兄弟，理學更發揮光大了。南宋，則朱子與陸九淵並

峙。陸尊德性，朱道問學。朱教學生讀書窮理，并會徧注羣經，故其學尙與經學相爲表裏。陸則主「先立乎其
大者」，曾言「堯舜所讀何書」，「六經注我，我不注六經」，且病朱之讀書窮理爲支離，其爲學實欲脫離
書本，直指心性。明代的陳獻章、王守仁皆遠紹陸氏之學者。獻章曾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
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通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物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此卽陸
氏「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與「心卽理」之旨。守仁則發揮陸氏「心卽理」之說，而輔以「知
行合一」之教。且以大學之「致知」爲「致良知」，良知者，吾心所固有，人人所同具，不待讀書而後得之，
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滿街都是聖人」。此與朱子之釋「格物致知」主讀書窮理，以爲道統之傳
在方冊，經旨不明，道統乃晦者，實大相逕庭。王學末流，至明末乃有李贄者，其思想已非孔孟所能範圍，其行
止已非禮教所能束縛，更何屑孜孜於經籍？那時王學已儼然成一種學閥，不學無術，純盜虛聲之徒，利其不
必費力於書本之研究，但拾人牙慧爲口頭禪，卽可鳴高，羣相趨附；於是空疏誕妄，學行俱無足稱者，亦皆竊
附於王學旗幟之下，而學風爲之大壞。——總之，漢唐經學爲客觀的，宋明理學爲主觀的。理學分朱與陸
二派：朱子於主觀中仍帶有客觀的色彩，陸王則爲純主觀的了。宋明的學風，其重心在理學而不在經學；北
宋之周程，分化而爲南宋之朱陸，由南宋之陸學，進而爲明之王學，其主觀的色彩愈濃而愈純，則其去經學

也，自愈趨而愈遠了。南宋至明，經學の日趨衰落，此其主因之二。

就經學的本身說，經北宋慶曆時的一變，已與漢唐大異。漢唐務實，宋儒架空；漢唐重客觀，宋儒重主觀；其趨勢亦正與上述二者相合。本喜架空，而墨義八股文又從而提倡之；已重主觀，而陸王心學又從而薰育之。相激相蕩，大勢所趨，自非釀成明末空疏妄誕之頽風不止了。

佛說一切流轉相有「生」、「住」、「異」、「滅」四相。梁啟超謂學術思潮之興衰恰亦具此四相，故可分爲四期：一曰「啓蒙期」，當佛說之「生相」；二曰「全盛期」，當佛說之「住相」；三曰「蛻分期」，當佛說之「異相」；四曰「衰落期」，當佛說之「滅相」。梁氏以此論清代之學術。其實，各時代之各種學術思潮，皆可作如是觀。我國經學，自孔子制定六經，孔門傳經之儒傳授六經，以及秦火之後，西漢之初，諸老儒之傳經，爲經學之「啓蒙期」。漢武以後，迄今元成之間，今文之經傳授不絕，十四博士立於學官，爲經學之「全盛期」。西漢末，劉歆發現古文經，於是經學分化爲「今文」「古文」二派，至東漢末而始合於鄭玄，此爲第一次；鄭玄之後，復有王肅，雖同爲混合今古，而故意與鄭立異，至南北朝，遂隨政局之分裂而分裂。北鄭南王，學者各有所宗，至隋，始隨政局而統一，此爲第二次；故自西漢末以迄於隋，爲經學之「蛻分期」。唐人雖承六朝義疏之學，而有注疏，但其經學已遠不如前；宋則變唐而不及唐，元則承宋而不及宋，降至明

代，大全之修，又襲元而并不及元了。經學至此，衰落已極。故自唐至明，爲經學之「衰落期。」

經學固爲我國特有的一種學術；但亦僅爲我國學術中之一支。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中心。兩漢以經學爲中心，雖文學方面，亦有其特盛之賦與樂府詩，但就全體衡之，似終爲經學的光芒所掩，故可謂爲經學的時代。自三國六朝至唐，則文學居中心的地位，如詩之古近體，小說之傳奇，文之駢文古文，詞之長短句，皆蓬勃萌芽於此一時期，而經學則已奄奄無生氣了；故可謂爲文學的時代。兩宋則爲理學的時代，此種新興的學術，實爲兩宋之中心。文學方面，惟詞爲最盛；詩與文，不過承唐之餘風而已；經學則已漸趨沒落，更無足論。至於元，則又轉爲文學的時代，曲與白話小說，實成熟於元；而經學、理學，則雖承宋而并不能及宋了。明代，經學更不及元；文學、詩文亦無足稱，惟傳奇與長篇小說略有可觀者；其尙可於我國文化史上占一地位者，惟理學中之一派，所謂王學而已。故祇能謂爲王學的時代。——我們論各時代學術的盛衰，不當但以經學爲標準，不當對於宋元明經學的衰落，甚而至於澌滅，抱過分的悲觀。何況剝極而復，經學在明以後還有復興的時代呢？

第十八章 經學的中興

兩漢爲經學的黃金時代，自魏、晉、南北朝，歷隋、唐、五代、宋、元，以至明末，亘千五百餘年，經學衰落，俱如上述。直至清初，始呈復活之象；迄乾隆之世，乃爲經學的中興時代。經學之所以復盛於清代，其因素有二：

(一) 學術方面的因素——王學至明代末年尙極盛，而其末流之弊，乃成「狂禪」。一般學者大多「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以「多學而識」爲「下學」而鄙視之，都欲冥索頓悟，「一以貫之」，自命「上達」。終至「空疏」、「妄誕」，學行二者，都無足稱。有卓識的學者，乃起而力矯之。如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提出「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二要旨，至名其書曰「下學指南」；又唱「經學卽理學」，「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正是對明末頹廢的學風而發的。當時國人受了被異族征服的大刺激，對於王學的末流，已生厭棄的心理，於是學風轉了方向，由「空」而反於「實」。經學自然應運而興了。

(二) 政治方面的因素——明自憲宗成化以後，科舉以八股文取士，束縛思想，消耗才力，莫此爲甚。顧炎武已有「八股之害，甚於焚書」的話了。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仍采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舉制度。因爲它是規定以四書爲題，而且須代聖人立言的，所以孔孟以後的史事，用入文中，便算犯規。這正是清廷求之

不得的愚民的妙策。這種八股文，自然是一般有識的學者所鄙棄的。他們的精力不肯消耗在八股文中，當然須另求發展。可是清廷以異族入主中國，猜忌最甚，所以清初的文字獄最多，羅織株連，爲禍亦最慘。詩文、歷史，足以賈禍，經世之學足以招殃；惟埋頭古書堆中，研究經學，倒是韜晦苟全的一條路。而清代皇帝，如聖祖、高宗等，復因勢利導，加以提倡。例如聖祖康熙時有御纂的周易折中，欽定的書經傳說彙纂，詩經傳說彙纂，春秋傳說彙纂等書，高宗乾隆時又有御纂的周易述義，詩義折中，春秋直解，欽定的周禮儀禮禮記三種義疏等，又詔刊十三經於太學。而當時大臣中，如秦蕙田、阮元、王引之等，也多經學大師，儼然爲經學家的護法。經學の日趨興盛，也有它政治上的因素的。

學術本身的關係，是經學中興的「因」；政治的關係，是經學中興的「緣」。章炳麟檢論清儒篇中有幾句扼要的話，說明經學中興的因緣，可謂簡要明白：『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詩歌文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知慧，大湊于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我們看了這幾句話，清代經學中興的原因，已可瞭然。

清代的經學，當以顧炎武爲開祖。炎武字寧人，明末崑山諸生，以曾讀書於亭林鎮（在松江南其地有小丘，爲梁顧野王讀書處，有亭，有林，因名。）學者稱亭林先生。因其繼母王夫人（炎武出嗣其叔同吉，王夫

人爲同吉妻，未婚守節。明亡時不食以殉，遺言「莫事二姓」，又嘗與歸莊等起義兵失敗，故終身不復仕於清廷，奔走南北，卒於華陰。嘗著音學五書以考古音，而日知錄一書，尤其畢生精力所注。閻若璩者，字百詩，號潛丘，太原人。康熙時，曾舉博學鴻詞，報罷。著有四書釋地等書。而所著古文尚書疏證詳列證據，斷東晉梅賾所獻之古文尚書孔安國傳爲僞書，喚起學者疑古求真的精神，於經學上之貢獻尤爲偉大。胡渭，字朏明，號東樵，德清人。所著禹貢錐指，爲自來治禹貢者之冠；又著易圖明辨，辨明河圖洛書先天太極諸說，一掃宋儒言易的架空之論。所以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以他們三人爲清學啓蒙時期的代表人物。

顧闈、胡三人在清代經學蕞路檻樓的時期，還是抱漢宋兼采的態度。因爲朱子雖然是理學大師，而其偏注羣經，實近經生訓詁之學。他常教人看注疏，不可輕議漢儒。又說：「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即從朱子之學者，如黃震、許謙、金履祥、王應麟等，亦皆學有根柢。所以清初諸儒所攻擊的，是王學，不是理學的全部，尤其不是朱學。當時務與朱子立異的學者，只有毛奇齡一人（奇齡，字大可，蕭山人。朱子疑僞古文尚書，而毛以僞古文尚書爲可信，著古文尚書冤詞，朱子信儀禮，而毛以儀禮爲可疑。其實毛氏之學，常欲立異以名高，不僅對於朱子爲然。）所以梁啓超論清代學術，說清學「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得解放」，可謂能總括清初學術界的情形。

那時候的學者，除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爲經學的「正統派」外，其餘尚有數派：（一）顏元、李璉等爲一派。他們以爲「學問不當求諸冥想，亦不當求諸書冊，惟當於日常行事中求之。」（二）黃宗義、萬斯同等爲一派。此派以史學爲根據，而推之於當世之務。同時的顧祖禹，以後的全祖望、章學誠等，皆祖述之。（三）王錫闡、梅文鼎等爲一派，專治天算，開自然科學研究之先聲。（四）孫奇逢、李顥、陸世儀等爲一派，則尙爲理學家守最後之壁壘。因爲和後來的經學沒有直接的重大的影響，所以都略而不論了。

清代經學的全盛時期，在高宗乾隆時。那時的經學有二大派：一曰「吳派」；一曰「皖派」。這一期的學風，和前一期不同。前期的大師，大都抱「經學卽理學」的觀念，所以兼采漢宋；本期則自固經學的壁壘，或置理學於不議，不論之列，或對於宋學亦標反對之旗幟，而有「漢學」之稱。前一期的大師，尙有「致用」和「經世」的思想，如顧炎武的奔走南北，還夢想恢復明朝，是最顯著的；本期的學者，則實事求是，爲經學而治經學，重在實證，而不重在議論，所以又有「樸學」之稱。所以梁啓超說：清學「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得解放。」

吳派的領袖人物是惠棟。棟字定宇，一字松崖，江蘇元和（今併入吳縣）人。其父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號半農，別號紅豆主人，本長於經學。棟既承家學，好博尊聞，著述極多，關於經學的，有周易述、易漢學、古文

尚書考、左傳補注、九經古義等。錢大昕爲他作傳，謂「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云。其弟子，以余蕭客、江聲爲最著。蕭客，字仲林，號古農，長洲人，著有古經解鈎沉等書；聲，字良庭，元和人，著有尚書集注音疏等書。而王鳴盛（字鳳喈，號西莊，嘉定人，著有尚書後案等書）、錢大昕（字辛楣，又字曉徵，號竹汀，嘉定人，著有十駕齋養新錄等書）、汪中（字容甫，江都人，著有述學等書）、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著有論語補注等書）、江藩（字子屏，號鄭堂，甘泉人，著有國朝漢學師承記等書）等，亦被其餘風。皖派的領袖人物是戴震。震，字東原，安徽休甯人。震之學，出於江永（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長於聲韻及步算之學，著有四聲切韻表、禮書綱目等書）。精於「小學」，著有六書論（今未見，東原集中有答江先生論小學書，尚存大義）。聲類等書；兼通天算，著有句股割圓記等書；而其畢生精誼所在，足以自成一家言者，則爲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二書。嘗力斥宋儒天理人欲不並立之誤，以爲「理也者，卽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理卽寓於欲中」。宋儒以意見爲理，舍是非而論順逆，然後以空理禍斯民。故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故梁啓超以爲他直欲建立一情感哲學。又說「惠僅述者，戴則作者。」總之，震之爲學，貴精不貴博，深刻斷制，重實證，重條理；近人說清代經學家的治學方法，含有科學的精神者，實指戴震這一派而言。段玉裁云：「先生合義理考覈文章爲一事，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於鄭朱，修詞俯視乎韓歐。」這

並不是阿其所好的話。戴震的弟子，最著者爲段玉裁、王念孫、段玉裁，字懋堂，金壇人。所作以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等爲最著。王念孫，字懷祖，高郵人。所作以廣雅疏證爲最著。念孫之學，傳之其子引之。引之，字伯申，所作以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爲最著。而清末德清之俞樾，（字蔭甫，別號曲園居士，所作以羣經平議、諸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爲最著。）瑞安之孫詒讓，（字仲容，所作以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名原爲最著。）亦皆承其餘風。而近來爲清學後勁的章炳麟（字太炎，餘杭人，有章氏叢書）也是俞樾的弟子。

戴震論學，與朱子牴牾，因爲他確有所見，並非故持門戶之見，欲抨擊前賢以見長。故其所作毛鄭詩考，亦嘗采取朱子詩集傳之說。惠棟紅豆山莊自題楹帖云：「六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尤可爲未嘗反對程朱之證。震嘗稱江永之學，謂「自漢經師康成後，罕與儔匹。」推崇可謂備至；而永嘗注朱子之近思錄，其禮經綱目亦仿朱子的儀禮經傳通解。震之弟子，段玉裁爲最，亦嘗議以震配享朱子祠。又嘗跋朱子小學云：「或謂漢人言「小學」謂六書，非朱子所云。此言尤悖。夫言各有當。漢人之小學，一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段氏以極精小學之人，而不以漢人的小學非薄朱子，可見惠、江、戴、段，雖標「漢學」之名，亦未嘗與理學之程朱之學故分門戶，將它一筆抹殺。因爲宋儒經說雖未能合於古義，而其學行實不愧於古人。江藩作國朝漢學師承記時，焦循曾貽書爭之，謂當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立名較爲渾融，免啓門

戶之爭。江藩不從。方東樹乃作漢學商兌，反攻漢學，肆其譏評，竟波及於戴震與顧炎武。戴震當乾隆時入四庫全書館，名動一時。當時桐城派的健將姚鼐嘗欲從震學，震拒絕之，且諷以微言。後來姚鼐持論，多張宋學，斥漢學。方東樹也是桐城派中的鉅子。所以當時長於文章的古文家，多和漢學立於反對的地位。

清代經學家治學之成績，第一是各經傳都有新著的注疏。今舉其要者，列一簡表如左：

經傳名 著 作 名 作者 附 記

《易》 周易述

惠棟

江藩有周易述補。姚配中亦有周易姚氏學。焦循亦有易通釋。

《易》 周易虞氏義

張惠言

以荀爽虞翻二家爲主，旁采漢儒諸家之說及乾鑿度等緯書。

《書》 尙書集注音疏

江聲

此二書皆斥僞古文尙書。其注，多采尙書大傳、史記及馬融鄭玄之說。江氏間入己見。王鳴盛

尙書今古文疏證

孫星衍

有尙書後案，段玉裁有古文尙書考異。

《詩》 毛詩傳疏

陳奐

陳書用毛傳而棄鄭箋。馬書仍用鄭箋。

毛詩傳箋通釋

馬瑞辰

鄭注孔疏外，並采宋元以後諸儒之說。

《禮記》 禮記集解

孫希旦

鄭注孔疏外，並采宋元以後諸儒之說。

《儀禮》 儀禮正義

胡培暉

胡承瑛亦有儀禮今古文疏義。

《周禮》 周禮正義

孫詒讓

此書於訓詁、名物、制度、考證均極精，爲治周禮最精之書。

《春秋左傳》 左傳舊注疏證

劉文洪

此書未成而卒，子毓崧續成之。惠棟亦有左傳補注。

春秋公羊傳

公羊義疏

陳立

劉逢祿亦有公羊何氏解詁箋及公羊何氏釋例。

春秋穀梁傳

穀梁補疏

鍾文蒸

邵晉涵亦有穀梁正義，但似未行世。

論語

論語正義

劉寶楠

戴望亦有論語注。

孝經

孝經鄭注疏

皮錫瑞

十三經中，本用唐玄宗注，此改用鄭玄。

爾雅

爾雅正義

邵晉涵

此二書均較舊邢昺疏精博。

爾雅義疏

郝懿行

孟子

孟子正義

焦循

孟子，舊僞孫奭疏。焦書去僞孫疏，仍用趙岐注。

章炳麟以爲「取精多，用物宏，皆勝舊釋」，並非過譽。研究禮類者，如黃以周之禮書通故，頗能兼綜三禮；秦蕙田之五禮通考，直欲窮二千餘年來之禮制，自比通典。雖章炳麟譏其不免「以世俗正古禮」，但終是一部治禮的鉅著。

第二種成績，是把漢人所謂「小學」，擴展推進，成爲有系統的文字學。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小學類所錄，不過是古人教學童識字的書。清代的經學家，因爲解經的需要，對於文字的聲音韻訓詁益加精研，并旁及於文字的形體。因爲古代的語言文字，和現代的不同，且古人經學重在口耳相傳的，往往有因方言語氣而顯出差異來的，例如「齊言」「魯語」之分，見於公羊傳；「長言」「短言」「讀爲」「讀若」等例，亦

不一而足。而爾雅及說文解字二書，尤爲研究訓詁形義的要籍。清儒的爾雅新疏，已見上表，而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更是精博之作。關於說文解字的，除最著名的段玉裁之說文解字注外，尚有桂馥的說文義證，王筠的說文句讀，說文釋例，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許慎的說文解字，自北宋初徐鉉徐鉉兄弟而後，似乎久不爲人注意，所以元明的學者很少研究它的。到清代，才有許多學者提倡研究，而此書幾與羣經傳記列在同等的地位了。聲韻是文字的三大要素之一，故研究文字學者，必研究聲韻。宋吳棫、明陳第已知講求古音。及清初顧炎武著音學五書，研究古音、唐音、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以及近人章炳麟、黃侃等，對於聲韻的研究，精益求精，聲韻之學遂著空前的成績。其由訓詁之學推及語詞之用法者，則有王引之的經傳釋詞，劉文淇的助詞辨略等；推及古書辭句之構造者，則有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等；這已引申到文法修辭學方面去了。

第三種成績，是校勘學方面的貢獻。西漢末，劉向父子領校羣書，爲校勘學之起原。顏氏家訓、匡謬正俗等書，也是有關校勘的。至宋，乃有劉放、劉恕、宋祁之校史。清代的經學家，以校勘著名的很多，如戴震、盧文弨、顧廣圻等尤精。戴震校刊水經注；盧文弨所校刊的抱經堂叢書；顧廣圻所校的說文、禮記、儀禮、國語、國策、文選諸書，并作札記，都很精確。而阮元的十三經校勘記功績尤爲偉大。所謂校勘學者，就是校正古書簡編之

脫亂文字之譌訛奪衍，使易於理解的一種工作。例如漢志說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這叫做「脫簡」。孟子在陳章「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一節，據俞樾說，當移置上文「曰其志嚶嚶然」句之下，而上文「曰古之人，古之人」七字，則爲衍文。這叫做「錯簡」。因爲古代以竹簡代紙，以韋或絲貫編成冊，編貫一斷，便致脫落錯亂了。「衍」是多了一個或幾個字；「奪」是少了一個字或幾個字；「譌訛」是文字寫錯了，或因形似而誤，或因音近而誤，或合二字爲一字，或分一字爲二字。因爲古代書籍是輾轉傳鈔的，所以文字易致衍奪譌訛，非經校正，往往費解。由校勘的工作，更推廣之，則有古書真偽的辨證，版本優劣的考究，書籍部居的整理，範圍更廣大了。

第四種成績，是「輯佚」。我國數千年來，書籍的厄運很多。如秦始皇焚書事，已見第二章。西漢帝王，勤求遺書，藏書甚多。劉向父子方校理就緒，而王莽之末，長安兵起，漢世所藏之書，又成灰燼。經東漢諸帝之提倡收集，東都蘭臺，東觀所藏，始漸復舊觀，而董卓挾獻帝西遷時，縑帛圖書，又復散失，大者取爲帷帳，小者用作膾囊；西京大亂，所收載以西的七十餘車，亦復蕩盡。經魏及晉，鄭默荀勗中經所錄，雖猶有缺，收集已多；而西晉五胡之亂，都城淪陷，又燬於兵燹。南朝之書，一燬於侯景渡江之亂，再焚於周師入郢之時。隋牛弘請開

獻書之路表述之甚詳。隋以前如此，唐以後也可推想而知。總之，經過一次變亂，書籍便有一次極重大的損失。所以遺佚的古籍，必不在少數。宋王應麟輯三家詩及鄭氏易注，已開「輯佚」之風。清儒對於輯佚書的工作，也很勤奮。惠棟親定體例，教弟子分輯古書；余蕭客的古經解鈎沉，便是輯古代已亡佚的經說的。餘如孫星衍輯馬鄭尚書注，陳喬樞輯三家詩遺說考，以及章宗源的玉函山房叢書，都是在輯佚方面，卓著成績的。

清代學者的校勘、考證、輯佚、訓釋等工作，初但致力於羣經，後乃推及於子史。如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俞樾的諸子平議等，是總括諸史或諸子的，而王念孫的讀書雜誌，也兼及子史。至於就專書致力的，則子部如王先謙的莊子集解，孫詒讓的墨子間詁，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等，史部如梁玉繩的史記志疑，王先謙的漢書補注等，都是極精博的著作。這是由經學的研究，推擴開來的。

清代有兩部彙集諸家經說的大叢書，便是皇清經解和續皇清經解。前者由阮元編輯，彙刻於廣州的學海堂，所以又名學海堂經解，所收清儒解經之書，凡一百八十八種；後者由王先謙續輯，彙刻於江陰的南菁書院，所以又名南菁書院經解，凡二百九卷。清儒關於經學的著作，大致已萃於此二書了。我們看了這兩部大叢書，已可想見清代經學之盛，不但非唐、宋、元、明所可及，亦且超軼兩漢哩！

四庫全書書目提要總敘有一段話，敘述兩漢以來的經學，頗爲扼要，現在摘錄如左：

「自漢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卽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陸，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原注：「如王柏、吳澄考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分，攀援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原注：「如論語集注誤引包咸、夏瑚商榷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卽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三十二篇，許謙擬之，吳師道反以爲非之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原注：「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原注：「如一字音訓，動輒數百言之類。」）」

按紀昀作四庫書目提要時，正當惠戴講漢學專宗許鄭的經學極盛時代；那時學者解經，繁稱博引，間有如漢人秦延君之流，顏之推所譏爲博士賣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但此種繁冗之病，以吳派爲甚。紀氏以數百字總括二千年來經學得失，且各以一字斷其流弊，雖不能說他毫無偏見，麁雜其間，但確足以供我們作一個提綱挈領的總說。他所謂失之「拘」者，指兩漢篤守師法家法的經學；失之「雜」者，指魏晉至宋初的經學；失之「悍」者，指宋仁宗以後至南宋的經學；失之「黨」者，指宋末至明初的經學；失之「肆」者，

指明末的王學，失之「瑣」者，指清代乾隆以前的經學。凡是一種學風，到極盛之後，當然要發生流弊的；紀氏所論，也可以說是「雖不中，不遠矣」了。

第十九章 經今文學的復活

梁啓超論清代學術，分之爲四期，而以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得解放，」是指清初顧閎諸儒，爲經學復興之初期；「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得解放，」是指乾隆時惠戴諸儒，爲經學全盛之時期；這二期的經學，上一章已略述其大概。「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得解放，甚且對於孔孟得解放，」則指嘉慶道光時，經今文學復活以後而言。這是我國二千年來經學史的最後一個時期，其影響直及於我國現在的學術思想，當於本章中述之。

經今文學的首倡者，是乾隆時與戴震同世的莊存與。存與，字方耕，武進人，著有春秋正辭，不斤斤於訓詁名物，而專講公羊家所謂「大義微言」；其治學的途徑與在當時負盛名的惠戴諸人截然不同。因爲十三經注疏中，祇有何休的公羊解詁是今文家言。所以今文學復活的出發點是春秋公羊傳。但是莊存與並不能說是一個純粹的今文學者，因爲他還著有周官記、周官說、毛詩說等，這些都是關於古文經傳的。他的弟子以宋翔鳳、劉逢祿爲最著，而在學術上的地位和價值，則宋不如劉逢祿，字申受，陽湖人，是莊存與的外

孫著有公羊釋例（原名爲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此其簡稱。）公羊何氏解詁箋、左氏春秋考證等書。他專主董仲舒、李育之說，確守今文的師法。公羊釋例一書，有系統，有例證，有斷案，深合於漢學家近於科學的治學方法。所以信從古文的章炳麟，也不能不稱它「屬辭比事，類列彰較，亦不欲苟爲恢詭，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懌」了。因爲莊存與、劉逢祿等都是常州人，所以復活的今文之學被稱做「常州學派」，與惠棟的吳派、戴震的皖派相鼎峙。其後，仁和龔自珍定菴（麗正子、段玉裁外孫。）雖沒有經學的專門著作，而喜引公羊義譏評朝政，也足爲今文張目。可惜他仍襲用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六經皆史」，明李贄已有此言，見焚書。）作六經匡名一文，以自陷於古文家言，終不能成爲一純粹的今文學家。邵陽、魏源、默深，作詩古微，主三家詩，攻毛傳及大小序；作書古微，并指馬融、鄭玄的古文尙書也不是孔安國的真說。仁和、邵懿辰位西，作禮經通論，論儀禮十七篇並非殘缺，逸禮三十九篇出劉歆僞造。德清、戴望、子高的論語注，也主今文家言，引公羊義例以爲訓解。而當時輯佚的工作，也大有助於今文學。如迺鶴壽的齊詩翼氏學、馮登府的三家詩異文考證、陳壽祺的三家詩遺說考及其子喬樞的詩經四家異文考、齊詩翼氏學疏證等，專輯今文詩的遺說；陳喬樞的今文尙書遺說考、尙書歐陽夏侯遺說考是專輯今文尙書的遺說；玉函山房所輯更多，如尙書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周易施孟梁丘京四家章句、公羊嚴氏春秋、公羊嚴氏記、齊論語等。在他

們未必是有意提倡今文，而今文學終因之復活了。至清德宗時，善化皮錫瑞鹿門，作經學通論及經學歷史，也主今文說；湘潭王闈運壬秋也，曾以今文義編注羣經；他的弟子成都廖平季平，著四益館經學叢書，其中以今古學考一書爲最有系統。及康有爲出，乃集經今文學之大成。康初名祖詒，字廣夏，一字更牛，號長素，南海人。爲德宗戊戌變法的主角。有爲初亦兼治古文經，及見廖平之書，乃專致力於今文之學。他的著作，以新學僞經考及孔子改制考二書爲最有精采。近人崔適，作春秋復始，說穀梁傳也是古文；作史記探原，說史記是今文，其所以雜有古文說者，全由劉歆竄入。於是經今文學，在清末遂達於全盛時期。

經今文學之所以復活於嘉慶、道光之世，而全盛於清末，也和經學之中興於清之初世一樣，有它內在的「因」。（學術本身的因素。）外鑠的「緣」。（國家政治的因素。）清代經學極盛之後，其流弊不免如紀昀所譏的失之於「瑣」，一字的訓詁，一音的聲韻，一物的名稱，以至一種制度，一條校勘，動累千言，已夠使學者看了頭痛；且其所爭議研究者，盡是些書本上的死文字。這時有學者出來作「微言大義」的探討，自然覺得它是異味了。一方面，如梁氏所說，清代經學第一步是復宋之古，第二步是復唐之古，又進而至於東漢；那末，更由東漢推而上之，以及於西漢，也正是自然的趨勢。這可以說是關於學術本身的內在的「因」。嘉慶以前，正是清廷全盛之時，故一面則國家社會安寧，學者有專心讀書的餘裕；一面因異族的帝

王猜忌漢人之故，文字獄迭興，學者不敢談「經世」之務，而羣趨於「與世無爭」的古經研究，以「有託而逃」。到了道光咸豐以後，內則有太平天國之亂，外則有鴉片戰爭之敗，不但清帝的權威日替，且有國勢危亡之懼。於是有識之士，不滿於經學家之斷斷於書本中的章句文字，而復昌言經世救國，而借公羊家「三世」「改制」之義以譏切時政。這可以說是關於國家政治的外鑠的「緣」。有此因緣，於是自東漢末鄭王混合今古文以後，埋沒二千餘年，已成化石的西漢今文之學，遂頓呈復活之象了。

清末經今古文學各有一殿軍的後勁，一是古文大師章炳麟，一是今文大師康有爲。康氏認爲古文經傳全出劉歆偽造，故目之曰「偽經」，認爲古文經學不是西漢的經學，而是新莽之學，故諡之曰「新學」。他這部新學偽經考，是對於古文經學下總攻擊的；友人周子同君曾撮述它的大意道：

「一、西漢經學無所謂「古文」，一切古文都是劉歆偽造；

二、秦始皇焚書，六經未嘗受災，西漢今文十四博士的傳本並無殘缺；

三、篆隸之說不足信，孔子時所用字體就是秦漢時通行的篆體，就文字說，也無所謂古今文；

四、劉歆想遮掩作偽的痕迹，所以校中祕書時，對於一切古書多加以淆亂；

五、劉歆作偽的動機是想佐王莽篡漢，所以崇奉周公而毀滅孔子的微言大義；

六、古文經所以流傳，是由於東漢通學鄭玄的混淆家法。」

他攻「偽經」也自有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番議論。此書雖遭清廷焚禁，現在却並不難得。要知道今文派議論的大旨，很可以細細一讀。他又著有孔子改制考，說先秦諸子皆「改古改制」，六經也是孔子「託古改制」的著作。堯舜之治即是孔子改制的理想社會，而託之於古的。從這部書引申出來的，便有他的大同書。這部書中所描寫的「大同」社會，可以說是康氏的理想社會，簡直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理想。康氏在清末已有這種理想，不能不說他思想的急進。可是他在事實上，竟是一個復辟黨的領袖，在民國初年，導演過一幕張勳復辟的滑稽劇，這是什麼緣故呢？他深信所謂「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大同世）之說，以為現在還是據亂世，所以力主君主立憲以期實現小康之治了。康氏行動上的開倒車，固然是不值得齒數的，但在經今文學方面，其所貢獻，却不能不承認其鉅大，雖然武斷的議論是很多的。所以他和章炳麟可以說是清代經學今古文兩派最後所結的兩個碩果。

經今文學及於其他學術思想的影響怎麼樣呢？我們可以分三方面來看：

（一）文字學的研究方面——清代經學全盛時代，文字學的研究也隨之勃興；前一章已述說過了。那時候，研究文字學差不多以十三經中的爾雅及許慎的說文解字二書為中心。今文派復活以後，對於文字學，嘗有過猛烈的攻擊，如康有為偽經考說：「小學」者，文史之餘業，文史之餘技，豈與六經大道並哉？

六經之末而附以「小學」……此劉歆提倡訓詁，抑亂聖道，僞作古文之深意也。」又說：「歆既徧僞羣經，又欲以訓詁證之……自此經學遂變爲訓詁一派，破碎支離，則歆作俑也。」他認爲劉歆所以竭力倡導「小學」實爲掩護他所僞造的古文。此其一。孫星衍爾雅釋地四篇後敍說：「爾雅所記皆周官之事。」陳啓源毛詩稽古編考爾雅多與毛傳同。康有爲也說：「爾雅訓詁以釋周官，毛詩爲主。釋山則有五嶽，與周官合，與堯典王制異；釋地九州與禹貢異，與周官略同；釋樂與周官大司樂同；釋天與王制異，祭名與王制異，與毛詩周官合。若其訓詁全爲毛詩。」可見爾雅是古文說。說文序說：「其稱易，費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可見說文實爲古文經傳的淵藪。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中有說文序糾謬一篇，曾說：「歆僞經之光，則賴鄭玄之功；僞字之光，則賴許慎之功。」所以說文中所謂「六書」，康氏以爲僅見於周官，不見於他書。（左傳雖有「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的話，也是古文家言。）除許慎說文及鄭玄周官注外，西漢博士絕不談及；故於「六書」說的本身，雖亦稱其條理甚備，而所謂「古文」者，則認爲絕不足信。康氏之意，以爲劉歆「僞託於經，則不得不惡而辯之」，其攻駁之詞，也有一部分有理由的。（如說小篆於古文筆畫反多增加，不合文字進化由繁而簡的原則；說古文出於孔子壁中，而壁中得書的事，是根本不可信的；說文字的變遷由於社會的自然趨勢，不是某一個人所能改造，故程邈造隸書之說已不

可信，而漢志所謂「施之徒隸，故曰隸書」，更是有意斥辱今文之類。總之，今文家治經，重在微言大義，不重在文字訓詁，文字學的研究，本不如古文家之視爲極重要的工作；又因其來源，其要籍，都與古文有關，所以盡力攻擊的。這種攻擊，消極方面，固足以阻礙正在發展中的文字學之研究；但積極方面，却又給予文字學以解放的機會。古文家之長於文字學，如章炳麟者，尙且爲說文所拘束，認爲鐘鼎是不屑研究的，甲骨文是偽造的。經今文家一番攻擊後，說文的地位已發生動搖；又自甲骨文於光緒時在安陽發現後，學者以與鐘鼎文字同有研究的價值；文字學乃得解脫了說文的束縛，而別闢一新的蹊徑。——這是經今文學的第一種影響。

(二) 古代史和史學的研究方面——我國研究古代史者，有兩種相反的觀念：一種是「退化論」，帶有悲觀的復古的色彩；一種是「進化論」，帶有樂觀的、改進的色彩。前者認爲堯舜之世是我國的「黃金時代」，一切政治道德都已達最高的地步，其後，則「帝降爲王，王降爲霸，霸降爲雄」，一蟹不如一蟹地退化下來了。他們對於現實是悲觀的，對於上古是迷戀的。後者却以爲世運是進化的，我國文化燦爛的時代，不在上古堯舜之世，而在春秋戰國諸子蠡起的時代；秦漢以後，雖沒有長足的進步，但終在漸漸地進展着，而且如能努力振奮，今後也很有上進的希望。他們不迷戀於上古，而在希望着將來。經學中「古文」

「今文」二派的論調，正各和上述二種觀念相合。古文家相信六經中所記堯舜之治是真實的，相信周官是周公致太平之書，或已實行過，或是預定而未行的計劃。今文家以爲周官一書，至早是戰國時人理想中的官制，六經中所說的堯舜之治，是孔子爲了託古改制，藉以宣傳的一種理想的烏託邦。這種「太平」「大同」之世，是他對於將來的一種憧憬着的希望。所以經今文學的議論，影響於古代史的研究者，足以改變它的根本觀念——一種退化的、復古的、悲觀的舊的歷史觀。此其一。堯舜之治，既是孔子託古改制的理想，是一種烏託邦，而不是可信的史實，則其他史實，可疑者必多。於是引起了對於古史的懷疑論。顧頡剛認爲「古代的史實完全無異於現代的傳說：天下的暴虐歸於紂，與天下的尖刻歸於徐文長是一樣的；」胡適認爲「包公身上堆着許多有主名或無主名的奇案，正如黃帝周公身上堆着許多大發明大制作一樣；李宸妃故事（即狸貓換太子的故事）的變遷沿革，也就同堯舜桀紂等等古史傳說的變遷沿革一樣，也就同井田禪讓等等古史傳說的變遷沿革一樣。」這種懷疑古史的思想，至少，是有意的或無意的，受了今文家孔子託古說的影響。此其二。研究古代史，不能不研究古代的制度；而古代的制度，只能求之於古代的經籍中。可是今文、古文兩派對於古代的制度，說解亦復不同。例如封建之制，今文說以爲所封之國，分五服，各五百里，分三等，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畿內亦封國，天子五年一巡狩；古文家則以爲所

封之國，分九服，亦各五百里，分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王畿內不封國，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又如官制，今文家以爲天子立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而且無世卿，有選舉；古文家以爲天子立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而以三孤副之（少師、少傅、少保，亦謂之三少）三公、三少皆無屬官，此外尚有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皆有屬官，共三百六十，而且有世卿，無選舉。自從經今文學復活以後，從前所認爲信而有徵的古代制度史，不是變成尙待考證的史料了嗎？此其三。我國研究史學的專著，較有系統的，爲一般人所推崇的，只有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史通六家申左諸篇，於左傳則時加褒揚，以爲「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述者之冠冕」；於漢書亦稱其「言皆精練，事甚該密」；至於史記，則譏其「所載多聚舊記，時采雜言」。文史通義則大唱「六經皆史」之說；校讎通義則對於劉歆的七略、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大加推崇。劉、章二氏之說，都是偏於古文經學一方面的。今文家則以爲左傳是和春秋經無關的，是劉歆從國語中分出，且加以改竄的；司馬遷生於古文經未出之前，又習聞今文學大家楊何、董仲舒（史記太史公自序言其父談習易於楊何，又有「余嘗聞董生曰」等語）等之說，故其說多與今文合（如五帝本紀、夏殷周本紀、孔子世家、儒林傳、太史公自序諸篇）至其中雜有古文說的（如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儒林傳

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十餘篇。』皆係劉歆竄入的；而漢書藝文志全襲劉歆七略，顛倒六經次序，列古文經於孔子今文經上，盛稱古經，斥博士今文之學，奪孔子之學以上託於周公；果如所說，則左傳爲僞書，史記爲信史，漢書爲劉歆信徒的著作，是掩護僞經之書。不是把僅有的兩部史學名著都推翻了嗎？此其四。所以經今文學及於古史研究和史學的影響是很大的。

(三) 古代學術史研究的方面——我們研究古代學術，無論對於孔子的觀感如何，不能不承認他在古代學術史事實上的地位。但是孔子的真相畢竟如何，却至今還沒有人敢斷定。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引新民叢報上他自己的話道：『寢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庵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顧亭林，戴東原矣。』這一段話，很能指出我國數千年來學術屢變，而都拊着孔子爲招牌的弊病。我們還可以繼續說：『寢假而孔子變爲廖平，康有爲矣。』這真如韓非所謂「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取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子，孔子不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了。所以孔子的真相，至今仍是迷離莫辨。我們要研究古代的學術，便不得不注意到孔子；要研究孔子的真相，便不得不從兩漢經生、唐宋文人、宋明理學家，以及清代經學的古文家、今文家所描寫的孔子中去剔括爬梳。這是第一點。我國學術界向來崇奉孔

子，稍涉懷疑，便以「非聖無法」斥之。我們知道，學術思想之發展，有待於懷疑的研究精神。孔子既成了一個人至尊無上的偶像，對於他不許有絲毫懷疑，自然成爲思想上的統制者，學術進展上的障礙物了。對於經傳懷疑的，唐宋以來，固不乏人，前幾章都各有述及。但到了晚清的今文學者，乃公然斥古文經傳爲僞書，以爲是劉歆佐王莽篡漢的工具；其懷疑大膽，實爲前所未有的。但是廖平曾因此被張之洞威逼，卒屈服而自變其說。（他初主古文爲周公，今文爲孔子之說，繼更進而主今文爲孔子真學，古文爲劉歆僞學之說，原爲今文學家之言。後受張之洞的脅誘，竟說今文是小說，古文是大統，前後自相矛盾。）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也會被清廷焚禁；以懷疑精神研討經籍，仍受政治勢力的壓迫。及政體鼎革後，思想解放，這種懷疑精神始發生很大的影響。而且今文家所以主張孔子託古改制，原是竭力推崇，想尊孔子爲「素王」，爲教主，以爲孔子是爲萬世創教立制；但孔子的託古改制既和先秦諸子一樣，則無形中，其地位已降而與諸子平等，不復站在籠罩一切、至高無上的地位了。恰好那時經學家研究的工作，已漸漸地由經而及於子，科舉時代不被人們重視的子書，也有人努力研究，於是儒家不過九流中的一流，孔子也是諸子中的一子，遂爲今日大家所同具的一種思想了。這是第二點。從前的人尊崇孔子太過，致把他看做一個超人，一個神，甚至於是一個泥塑木雕的偶像，毫無情感、毫無生氣。今文家理想中的孔子却是一位熱心救世，想改革當時制度，創造新

社會，建設新學派的人物，具有「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百折不撓的意志與精神的。這樣一來，孔子就生氣蓬勃了。我們知道孔子是聖人；聖人也是一個活潑潑地的人。以人情事理去研究孔子，去讀關於孔子的書，方能獲得真正的意義。這是第三點。秦漢以後，我國的學術思想爲孔子所籠罩，幾千年來的學術，不外「經學」「理學」二派迭爲盛衰。前者在章句訓詁名物上用工夫；後者在心性理氣修養上用工夫。前者祇是書本上的工夫；後者祇是個人身心上的工夫。自今文學家出，他們的工夫，不重在書本，不重在個人的修養，而着眼於政治社會的改革；這真是跳出幾千年來盤旋的圈子而獨樹一幟，另闢一學術思想的新境界了。這是第四點。

據上所述，則今文學的復活，其影響於我國學術思想界者，至爲鉅大。而且非當時的今文大師們始料所及。且從此以後，反因範圍擴大思想解放，而經學反形衰歇了；這大概是「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吧！




第二十章 經學的附庸——文字學

漢書藝文志於六藝略末，孝經類之後，著錄史籍篇諸書，特立一類，名曰「小學」。所錄各書，都是古代教學童識字用的字書，所以名爲「小學」。周禮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以「六書」。漢初，蕭何定律，也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的規定，稱這類書爲「小學」。原也確如其分。其所以附於「六藝略」者，因爲經學重訓詁，故以教授文字的「小學」書爲經學的附庸。後來這種學問發達起來，成爲研究文字的專門之學，「小學」這名詞已不適用，當正名之曰「文字學」了。現在研究文字學的專書，可謂已汗牛充棟，因爲他是經學的附庸，所以在本書之末，略述它的大概。





漢志序小學類云：「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六書爲造字之本，故爲文字學首當研究的問題。保氏官名，周禮地官司徒之屬。鄭玄周禮注引鄭衆說，則以「六書」爲「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許慎說文解字序所舉「六書」名稱，則又爲「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三家釋「六書」名稱次第，各有不同，現在先列表對照如左：

班固說	鄭衆說	許慎說
象形（一）	象形（一）	象形（二）
象事（二）	處事（五）	指事（一）
象意（三）	會意（二）	會意（四）
象聲（四）	諧聲（六）	形聲（三）
轉注（五）	轉注（三）	轉注（五）
假借（六）	假借（五）	假借（六）


班鄭二氏僅舉六書之名，許氏則各下八個字的定義，各舉二個字的例證。現在就許氏所說，逐一說明如左：

（一）指事 許曰：『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上下」古篆作 ，「下」或作 。先以「一」作「標幟」或在「一」之上畫一記號，或在「一」之下畫一記號，以表示在上或在下的意思。「視而可識」者，一看可辨識它在上或在下；「察而見意」者，細察之方見造字者的意思。又如「高」篆作 ，「視畫了一座樓房的側面，這是一看就認識的；造字者以樓房之高，代表一切高的意思，則須細察之方能體會到的。「事」是一切動作、狀態、地位……；借「形」以指示之，故曰「指事」。所以「指事」一名，比「象事」

「處事」來得明白。

(二) 象形——許曰：「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隨某種物件的方圓斜正，屈曲地畫成其形，以爲代表此物的文字，叫做「象形」。「日」古篆作或，即象日形，內爲日中黑影。「月」古篆作，月圓時少，缺時多，故畫新月之形，亦以示與日字有別。又如「亦」爲「腋」之本字，篆作，象人形，以標識顯示其兩腋，其象形之法，比日月二字更妙了。

(三) 形聲——許曰：「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山川鳥獸草木之名，如造象形字，則形都相像，只可以作共名，（如凶表一切之山，木爲一切之木。）不能顯示其區別，以作別名。不得已，乃取代表其共名之原有的文字以表其形，又取譬於吾人口語中呼此物的音，以表其聲，合形與聲的兩部分以成一字，叫做「形聲」。例如江、河，皆水名，故取「水」字以表其形；吾人呼此二水之名，音近於「工」「可」，故取「工」「可」二字以表其聲。這類字，班氏叫做「象聲」，鄭氏叫做「諧聲」，都僅指表聲的一半說，不如「形聲」一名，意義賅括。

(四) 會意——許曰：「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武」本作，從止戈會意，言動干戈以侵略他人者，還不見得是武；能止住他人動干戈的，方纔是武。「信」字從人從言，表示惟人言乃有信，

且須有信方可謂之人言，否則與雞鳴狗吠何異。比類而合其誼，乃足以見造字者之指擲，故曰「會意」。班氏名之曰「象意」，意是抽象的，如何能象？故不及「會意」一名爲明白。

(五) 轉注——許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解轉注的，異說最多，以近人章炳麟說爲最明確。「類」指事類，「首」爲語根。例如「考」「老」其意同指年壽之人，故同屬一事類，同出一語根。老之音爲 *lǎo*，考之音爲 *kǎo*，韻尙相同，其聲已變，故意雖相同，爲之別造一新字。考老二字形雖不同，意仍無異，以同一意義換一不同之形體，恰如以壺中之水注入杯中，受水之器雖不同，而其所容之水仍同，故名曰「轉注」。轉注是指這二字的關係說的，如單就「老」字說，則洩字從人、毛、匕，（人之毛髮化而爲白，便是老。）爲會意；「𦍋」字從老省，丩聲，爲形聲了。

(六) 假借——許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轉注以音變而另造新字，假借則以音同或音近而借用已有之字，不復另造新字。如令字篆作令，從人，（集合之集的本字。）從卩，（卽符節之節。）會意。古代發命令，必合符以爲信，故「令」之本義爲「命令」。引申之，則發命令之人亦曰令，如令尹、縣令是。凡可以發令之人，必才德足以上者，故又引申爲美德美才之稱，如令德令才皆是。更引申之，則以爲尊稱之詞，如令兄令郎等。長本爲長短之長，引申之，則爲長幼之長，君長之長。此皆引申的假借。至如「祈」字，從示，

斤聲，爲禱求之義，其後音變，乃借本義爲皮裘之求字用之。（豸爲象形字。）此則爲本有其字的假借了。「然」字從𠂔（肉），從犬（犬），從火，會意，以燒狗肉表一切的燃燒；「而」字爲象形（𠂔）說文云：「頰毛也。」本義是鬚。今以「然而」二字爲轉折之詞，但借用其音，不復問其本義爲何，才是真的「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的假借。

上面所說，雖極淺近，六書意義，已可明白。班鄭許三家名稱不同，比較起來，以許氏所定之名爲最優。象形所象者爲具體之物；指事所指者爲抽象之事。物有形，故可象；事無形，只能借一象以指示之。描繪具體的物象易，顯示抽象的事態難；則造字之初，象形自當先於指事。此二書皆爲「獨體」之「文」；雖亦有合他文以象形指事者，但必仍有不成文的部分夾在其中。（如果字，下從木，上⊕但畫果子的形，並不是田字，如變從𠂔（掬）、從灝（林）、從𠂔（拱）、從火，但𠂔象鼎，（象灶門，皆不成字。）而會意、形聲，則爲「合體」之「字」了。但會意所合的文，無論兩個或兩個以上，都是表意的；形聲，則一部分表意，一部分表聲，較會意已更進一步；故以造字先後論，會意當先於形聲。以上四種，都可以說是造字的方法。轉注因音變而造字，則字以孳亂而益多；假借則因音同或音近而借用已有之字，字乃有所節而不至過多了，這兩種是造字時增減的原則。這樣說來，六書次序，當以班氏所列爲最妥。

一般研究文字學者，都認爲我國文字創於黃帝之時；創造文字的人，便是黃帝之史倉頡與沮誦。但倉頡，或又以爲是太古時禪通紀之帝王；對於他，更有四目和天雨粟、鬼夜哭等等神話。其實，「倉頡沮誦」卽「創契佐誦」四字之轉音，謂創造書契，佐助記誦；倉頡沮誦二名，卽爲創造書契時代的擬人化。（本近人沈兼士說）若信此二人爲黃帝之史，試問文字初造，安得有史？又安得有史官呢？黃帝時尙爲部落時代，豈能由一二人造作文字，頒行天下？文字初興，蓋由人事日繁，結繩之法不周於用，不得不另覓一種代表其意象與口語的聲音之符號，於是由圖畫而想出象形的文字來。彼時各人各畫，故古文之異體極多。但究竟起於什麼時候，則代遠年湮，無可考究了。由甲文金文推之，則夏商時當已有文字。——文字的創造，也是文字學所當研究的問題。

「古文」指籀文以前各種文字而言，凡見於金甲文者皆是。章炳麟等古文經派，篤守說文，不信龜甲鐘鼎之文，固然不對；康有爲等今文經派，因不信古文經，并不信古文，也是矯枉過正。金文的研究起於宋，如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等；及清代而大盛，如王昶的金石萃編，孫詒讓的名原等。友人朱建新近著金石學，對於金石學之專門研究，作初步的檢討與介紹，集諸家之大成，頗可供初學者之參考。甲文，清德宗光緒時方發見，後經劉鶚、孫詒讓，及近人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之收集、整理、考證，已成一有系統的研

究如梁文舉例殷商貞卜文字考、殷虛書契……可參閱之著述亦頗多。就金甲文以研究古文，在現代已較從前容易多了。——這也治文字學者的實際工作。

「大篆」亦曰「籀文」相傳爲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以劃一多異體的古文者。漢志即有大篆十五篇。王國維則謂此乃古代教學童識字之書，以首句爲「太史籀書」故名之曰史籀篇，非謂有太史名籀者作此書。籀讀也。籀書乃太史之職。如王氏所說，則彼時有無「同文字」的一番事實，也未可斷言了。「石鼓文」的字體，正是大篆；據近人馬衡考證，定石鼓爲秦時物，則秦代尙用大篆了。秦時李斯等奏同文字，採取大篆，或頗省改；或之者，疑之者，頗之者，少之；則秦代的小篆並非與大篆全異可知。我國統一之局成於秦，始皇李斯欲以政治勢力統制一切，故秦代之「同文字」是可能的事實。

至於程邈造隸書的話，則未可盡信。一則隸之與篆，不過結體繁簡，間有少異，而筆勢無殊。（漢隸筆畫亦渾圓，後乃漸有挑法，漸變方筆。）似非另造；二則文字之變遷，決非由某人改造，頒行全國，乃由社會的、大衆的、積漸的、無形的，衍變而成；三則所謂「以邈徒隸，故曰隸書」，「施之徒隸，故曰隸書」等話，正如康有爲所說，爲古文經派輕蔑今文的話。隸書寫得簡便草率，便成「草書」。草書有「章草」與「今草」（即狂草，亦曰一筆書）之別。張懷瓘書斷引王愔說，謂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乃有章草。按急就名書，乃取

首句「急就奇觚與衆異」之首二字，非指此書之字體而言；謂史游作草，殊未可信。章草由隸書漸漸變成，故仍有波磔，有隸意，不能指爲誰作。至於今草，則連綿書之，較章草尤爲放縱。張懷瓘謂東漢張芝變章草爲今草，亦不足據。隸書之筆勢由方而漸次復變爲圓，則爲「真書」。亦曰「楷書」。北魏碑文，其體尙在隸楷之間，是其明證。故嚴格言之，當稱漢隸爲「古隸」，楷書爲「今隸」。此亦自然的逐漸的衍變，並非有某人改造。宣和書譜乃謂東漢王次仲始作楷法，亦誤。今草太放，隸楷又太拘，介乎其間者，則爲「行書」。亦稱「行押書」。因爲畫行簽押時所用。張懷瓘說是東漢劉德昇所造，非是。今草與隸楷間之有行書，亦猶篆隸間之有「八分書」。不過行書與今草隸楷爲草勢拘放之分；八分與篆隸，則爲結體繁簡之分而已。八分似篆，二分似隸，故名八分。蔡琰所言，最得其真。而張懷瓘謂亦是王次仲所作，且云王次仲爲秦之羽士，更爲失之。——總之，字形的變遷，或形體由繁而簡，或筆勢忽方忽圓，忽拘忽縱，皆由自然之趨勢，非少數人所能改作。這也是治文字學者所當研究的。

以上所說，是關於字形變遷的研究的。至於字義的訓詁運用，也是文字學的重要部分。從前訓詁之法頗多；有以今語釋古語者，有以雅言釋方言者，有取音近之字爲訓者，有以共名釋別名者，有相反爲訓者。孟子引書「洛水警予」之後，卽釋之曰：「洛水者，洪水也。」洛水是古語，洪水是孟子時的今語。引詩「無然

泄泄」之後，卽釋之曰：「泄泄，猶沓沓也。」泄泄是古語，沓沓是孟子時的今語。爾雅釋詁，釋訓諸篇，也是如此。左傳記令尹子文幼時事，敍及他命名「穀於菟」之故，而釋之曰：「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因子文是私生子，被棄於野而有虎乳之，故名之曰乳虎，乳與虎，是雅言；穀與於菟，是方言。揚雄的方言，差不多全部都是以雅言訓釋方言，近人章炳麟的新方言，也是如此。易云：「乾，健也；坤，順也。」白虎通云：「夫，扶也；妻，齊也。」此皆以音近爲訓。劉熙的釋名，全用此種訓詁的方法。共名，謂同類之物所共有；別名，謂某物所獨具。別名之義，往往難於詮釋，則於其共名加分別之詞以釋之。如說文云：「柅，木也，實如梨。」木爲共名，柅爲木之一種，則爲別名。以木釋柅，又加「實如梨」三字以別之。又云：「牯，四歲牛。」「犍，牛純色。」牯，犍，皆別名；牛，共名，曰「四歲」，曰「純色」，皆所以別之。相反爲訓，最爲奇特。如論語引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注卽訓「亂」爲「治」。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臭」當訓爲「香」。史記項羽本紀：「呂馬童面之。」「面」當訓爲「背」。都是相反爲訓的實例。訓詁之法，原不僅此，但舉數例而已。

古人用字，有虛實變化之例。如曾國藩答李眉生書中所舉「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類。以現代的文法衡之，則非虛實二字所能盡。如「門」字爲名詞，是實字。公羊傳的「則無人門焉者」，左傳的「門於相門」，則爲虛字，且同爲動詞，但上句爲「守門」，下句爲「攻門」，則又有分別了。

如弟子及門者曰「門人」，（見論語。）大夫之嫡子曰「門子」，（見國語。）則「門」亦爲虛字，但爲形容詞，與作動詞用的又是不同。「人」字爲名詞，韓愈原道「人其人」句，則上「人」字爲動詞，下「人」字爲名詞，便不同了。左傳「豕人立而啼」的「人」字，則爲形容「立」字的狀詞了。至於「人魚」、「人參」的「人」字，則又是形容詞了。所以說非虛實二字所能盡。古人用代詞，分別甚細，如「吾」與「我」、「爾」與「汝」，於語氣格位上皆有別。近人胡適有吾我篇、爾汝篇言之甚詳。同是「死」的意思，也因階級不同而有種種無謂的分別，如什麼「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庶人曰死」。這些分別，現在都沒有了。諸如此類，也是文字運用方面，古今不同的地方。但字義極相近似，而實際上分別的，却不得不加以注意，如「聞」與「聽」，「見」與「看」，「儉」與「吝」，「剛」與「愎」之類。至於助詞，文言中則「歟」、「乎」、「哉」，語氣的強弱不同；在語體文中，則「呢」與「嗎」，用法亦異。又如古書中有同義字疊用至三個者，如左傳的「繕完葺牆」，戰國策的「不拊愛子其民」等；有疊用相對的二字，而祇取其一義者，如史記「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得失卽「失」，報任安書「無所短長之效」，短長卽「長」，「緩急人所時有也」，緩急卽「急」等。這些都是文字運用方面的變化。——文字的訓詁與運用，都是關於字義的，也都是治文字學者所當注意的事項。

聲韻之學，向來獨立於文字學之外。其實，文字有形音義三要素，則文字學當然須包括形體、訓詁、聲韻三項；況且治文字學而不懂聲韻，仍不能融會貫通，得其要領；所以我認為應當把聲韻之學包括在文字學範圍之內。王筠說文釋例說：『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於是書之爲文字。文字者，所以爲聲與意之迹也。』看見事物之象，構成心中之意，這是未曾宣達出來的「義」；在口頭發表出來，以爲這意義的代表，便是「音」了；書寫成文字，以爲代表他心中的「義」，口中的「音」的符號的，方是文字之「形」。形、音、義三者的關係既如此密切，則研究文字學，決不當把聲韻劃出在範圍之外！

「音」比較「形」和「義」要抽象得多；而且須口耳相傳，極難捉摸；所以向來認爲不易研究。「聲」是發音，卽子音（Consonant）；「韻」是收音，卽母音（Vowel）。聲與韻相切合，乃成一音。我國的文字是單音字，故或獨用一個韻，或上半爲聲，下半爲韻，以相切合。此理至爲淺顯，凡是讀過拼音的外國文，或學過注音字母的，都易懂得。例如「ㄅ」切，卽成「巴」；「ㄆ」切，卽成「麻」。現在小學生也都會的。可是「反切」的道理，有許多老先生們覺得非常艱深，是什麼緣故呢？第一，因爲從前反切所采用的字，上一字並不是僅表「聲」的，不但不是短促的入聲字，而且帶着收鼻音的；下一字並不是純粹的「韻」，往往帶着前

半個「聲」的；所以即使讀得極快，也切不出「音」來。例如「當公切」，便不易切出「東」字來。「當」注音作「ㄉㄨㄥ」，應除去下一個韻母，僅用其聲母「ㄉ」；「公」注音作「ㄍㄨㄥ」，應除去上一個聲母，僅用其複合的韻母「ㄨㄥ」；則「ㄉㄨㄥ」切，便是「東」了。第二，古音的聲，有與今音不同的，如輕唇音的字，古都讀重唇音；因此，古代韻書中，常用重唇音的字來切輕唇音。此在古人讀之，原無分別；而今人切起音來，便格格不能吐了。廣韻：『眉，武悲切。』古音眉、武，皆讀重唇；今音則眉屬「ㄇ」母，武屬「ㄨ」母，武悲切，決不會讀成眉了。第三，古人以字母別聲類，往往同一聲類，有剛柔二音，而分別不清。現在的注音字母中，却都有分別。如「ㄍ」、「ㄎ」、「ㄏ」一剛一柔，同屬「見」母；「ㄎ」、「ㄏ」也是一剛一柔，同屬「溪」母。舊字書中的切音，往往以剛音的字切柔音，以柔音的字切剛音，所以切出音來，往往與今音不合。其實，現在各地方音，剛柔不同的實例是很多的，例如「交」字，有的地方讀「ㄐㄧㄠ」，有的地方讀「ㄍㄧㄠ」。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第四，音有「四等呼」，開口、齊齒、合口、撮口。舊法反切，辨等呼也不容易；現在的注音字母，則以「一」（用於齊齒）、「ㄨ」（用於合口）、「ㄩ」（用於合口）三介母，夾在聲母韻母之間，以辨等呼，便很明白；比較以「干官堅捐」、「安焉宛淵」……等口訣來說明，便利得多了。

「四聲」之分，起自齊梁。梁武帝問：『何謂平上去入？』周捨答以「天子聖哲」四字。因為這四字就

屬平上去入四聲；而且「平上去入」也是就四聲中隨意取四字以代表之。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四聲卽「王道正直」卽「東董凍篤」四聲之別，說得簡單些，便是收音的長短：假定平聲是四拍，則上去便是三拍，二拍入聲便只有一拍了。收音不但因長短而有四聲之分，還有因收音的不同，而有「陰聲」「陽聲」之分。陰聲是沒有收鼻音的，如注音字母「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ㄨ、ㄩ、ㄨㄛ、ㄨㄜ、ㄨㄝ、ㄨㄞ、ㄨㄟ、ㄨㄠ、ㄨㄡ」諸韻母；陽聲是有收鼻音的，如注音字母「ㄊ、ㄊㄨ、ㄊㄨㄛ、ㄊㄨㄜ、ㄊㄨㄝ、ㄊㄨㄞ、ㄊㄨㄟ、ㄊㄨㄠ、ㄊㄨㄡ」諸韻母。入聲過促，故卽有收音，亦不易辨。故古音陰陽對轉，以入聲爲樞紐。

「韻」有平上去入之分；「聲」亦有「喉」「舌」「齒」「唇」與「戛」「透」「轆」「捺」之別。「聲」之分「唇」「齒」「舌」「喉」諸音，原是由聲音經過口腔時受阻礙的處所而異。直出於喉，逕呼而出，不受阻礙，是曰「深喉音」，如「ㄚ」「ㄛ」「ㄜ」「ㄝ」音發於喉，至舌根與軟顎間而受阻者，曰「淺喉音」，如「ㄨ」「ㄨㄛ」「ㄨㄜ」「ㄨㄝ」。至舌葉與口蓋間而受阻者，曰「舌上音」，如「ㄐ」「ㄑ」「ㄒ」「ㄓ」「ㄔ」「ㄕ」。至舌頭與上齒齦間而受阻者，曰「舌頭音」，如「ㄉ」「ㄊ」「ㄎ」。至上下齒尖間而受阻者，曰「齒音」，如「ㄒ」「ㄒ」「ㄒ」。至下唇與上齒間而受阻者，曰「輕唇音」，如「ㄆ」「ㄆ」。至上下唇間而受阻者，曰「重唇音」，如「ㄑ」「ㄑ」。戛者戛擊，透者透破，轆者轆過，捺者捺住。如「ㄉ、ㄊ、ㄎ、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ㄗ、ㄘ、ㄙ」卽可以代表此四種分別。至於「清」「濁」

則是音階高低之分，清爲高音，濁爲低音。例如以南方音讀「當」與「唐」，「東」與「同」，則清濁之別，極爲瞭然。不過北方音，則濁音之平聲字，往往由夏類化作透類。這却是不可不注意的。

聲相同的字爲「雙聲」，韻相同之字爲「疊韻」。不但轉注、假借，有許多是雙聲疊韻的關係；還有以雙聲疊韻組合成的「諛語」，且以雙聲疊韻的關係而孳衍變化。例如「徘徊」爲疊韻，一變而爲「徬徨」，再變而爲「盤桓」；「倉卒」爲雙聲，一變而爲「匆促」，再變而爲「造次」。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又如「勃然」、「勃如」、「勃爾」，其語尾也是以聲音的關係而變化的。「而」之得借爲「如」，（孟子：「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也。」）「而」卽是「如」；「由」之得借爲「猶」，（孟子：「王由足用爲善。」）「由」卽是「猶」；「無」之用爲「麼」，（白居易詩：「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無」卽是「麼」。古無輕唇音，故無音同麼。也都是聲音的關係。卽鶉鴝之爲布穀，蟋蟀之爲促織，寺人披之爲寺人勃鞞，荀卿之爲孫卿，也都是因聲音而轉變的。——「音」與「形」、「義」關係至切；故治文字學，當先通聲韻。

我國治訓詁之學者，自爾雅方言以下，古代則有魏孫炎、晉郭璞等；近代則有清邵晉涵、郝懿行、王念孫等。治文字形義之學者，說文解字以下，宋徐鉉、徐鍇、清段玉裁、桂馥、朱駿聲、王筠諸人，則致力於說文；宋歐陽

修、趙明誠、清王昶、吳大澂等，則致力於金文；近人羅振玉、王國維等，則致力於甲骨文。至於聲韻，則或考古音，或究今音，自宋、吳棫、陳第以來，清、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陳澧等亦各有發明，近人章麟炳、黃侃、錢玄同、弟，也多供獻。我們要總括地加以整理研究，已不患沒有憑藉了。更由文字學而推之於考古，則如王國維之以甲骨文研究古史；由文字學而推之於言語學，也可藉此研究我國語言語詞語法的古今之變，方言之殊，於標準國語的前途，大有裨益；而且漢字、簡省筆畫，及羅馬字母拼音諸問題，也可據以探討。——所以文字學之在今日，已由經學的附庸，蔚成大國；這新開的園地，正待我們去種植哩！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三版

經
與
經
學

發 行 所	出 版 者	發 行 人	編 著 者
上海及各埠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張靜江	蔣祖怡 蔣祖怡 蔣祖怡



以石人字國音韻



C141925